



内部资料

国际财经评论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Business

2020 年 · 秋

中日韩经济合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研究院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产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9 月《国际财经评论》(内刊)



公众微信号

地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楼 934 办公室

邮 编：100089

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方式：010-8881 8121

传真：010-8881 0062

收稿邮箱：g20@bfsu.edu.cn

jinyujie@bfsu.edu.cn

网站：g20.bfsu.edu.cn

目录

中日韩经济合作

第一章 新时代中日韩高等教育国际化：比较、合作与未来.....	2
第二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日经济合作概况.....	20
第三章 基于 Shapley 值的中日韩跨境电商供应链协同利益分配博弈策略研究	32
第四章 继续推进中日韩经贸合作中的障碍与应对措施.....	38
第五章 全球治理视域下中日韩合作的未来走向.....	48
第六章 中日韩 FTA 战略信誉困境探析.....	58
第七章 中日韩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研究.....	67

第一章 新时代中日韩高等教育国际化：比较、合作与未来

韩睿兮 尹靖惠 牛华勇¹

【摘要】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世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日本、韩国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为了有足够多的国际化人才支持本国经济发展，都对教育进行了国际化改革，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和相应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了更好地提升三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和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韩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区域性合作的探索——“亚洲校园计划”，给目前对外合作办学提供了新的思路。2019 年 12 月中日韩成都峰会胜利召开，三国希望促进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三国经济合作有望进入“新时代”。这也为三国更深入的教育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比较中日韩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上的战略和政策，总结其中经验和不足，为下一步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同时，在中日韩“新时代”的背景下，为下一步中日韩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中日韩；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区域合作；世界一流大学

一、引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也正式改革开放，为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奠定了基础。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了 WTO 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 143 个成员国，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式与世界市场接轨。经济的全球化要求精通各国语言文化、法律法规、经济制度等人才，同时全球化也促进了科技的大发展，各国对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²这些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高等教育进行培养，所以高等教育也必须适应国际化的潮流。为了实现培养满足符合国际化标准的人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日韩先后都选择了用财政支撑自己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策略，通过提高在世界范围的学术地位来引领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例如中国的 211 和 985 工程、韩国的 Brain Korea 21 项目和日本的 21 世纪卓越中心项目。³2015 年中国又提出了“双一流”战略。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招收留学生和输出留学生最多的

¹ 韩睿兮 尹靖惠 牛华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² Kreber, C.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J]. 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 Learning, 2009, 10(118) : 1-14.

³ Yonezawa 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debates and realities[M]//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Springer, Dordrecht, 2011: 329-342.

国家。学术与科研能力也显著提高，目前 SCI 论文发表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顶尖大学的排名和逐年提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了更好地顺应这一趋势和促进中日韩的文化交流中日韩也曾经在区域高等教育方面进行了交流合作，如“亚洲校园”计划，探索了多边教育合作的新模式。随着 2019 年 12 月中日韩成都峰会的召开，三国希望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也为中日韩三国在教育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本文通过比较中日韩三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分析和比较其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吸取其中经验，为中国下一步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建议。另一方面，本文探讨了双边对外合作办学模式和以“亚洲校园”为代表的多边国际化合作的新模式不足和经验。为下一步中外合作办学和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提供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国内外现有的文献，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和意义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以及中日韩三国高等教育各自国际化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也有学者研究了中日韩“亚洲校园”计划的相关问题。

目前学术界受到广泛认可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是 Knight 在 2003 年提出的，即“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多维度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些维度既有全球的也有跨国界的，既有跨文化的，也有比较的；在此过程中，这些维度与高等教育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相结合”。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初步的看出，我们为何要选择国际化的教育道路，而不能走“教育封闭”的道路。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过程性，强调多维度融合的过程。融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问题。高等教育国际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主要体现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方面。⁴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明确提出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最早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是改革开放之后，龚放、赵曙光提出西方、日本等国家高等教育形成教育国际化热潮，我国需要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详细阐述了原因、意义和方法。⁵张寿松归纳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十个基本问题，成为了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的经典框架。⁶谭净通过比较国内六种最具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体系，为了保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评价标准更加的客观、简约、并且具有可发展性的原则，采取了理念与战略、学生流动、师资队伍、

⁴ Knight, J. (2003). Updated internationalisation definiti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33, 223.

⁵ 龚放, 赵曙光. 大学国际化——高等教育发展趋势[J]. 高等教育研究, 1987(4):29-35

⁶ 张寿松.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十个基本问题[J]. 高教研究与实践, 2003.

教学与课程、科研成果和合作办学这六个指标来评价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⁷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源、发展和政策的研究。杨德广和王勤分析了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中国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经济全球化推动教育的国际化, 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过程。⁸ 李增森和赵淑慧对“双一流”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方面认识的误区进行了梳理, 对如何更好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建议。⁹ 朱文等对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进行梳理, 全面总结了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对外交流合作政策。证明了政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¹⁰ Futao Huang 认为欧洲、亚太地区和美国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际化是双向的过程, 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控制人才外流, 也要保持我国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¹¹

国内外学者对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源、发展和政策的研究。曾小军从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动因、政策和挑战三个维度, 对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和国际化问题中遇到的如语言、教师多元化等问题都进行了分析, 对我国未来的政策制定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¹² 陈晓清对日本大学国家化战略的背景, 实施过程中的成效和未来的前景和现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对中日合作项目“亚洲校园计划”进行了分析, 为东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一步合作提供可借鉴的案例。¹³ Akiyoshi Yonezawa 认为日本大学和学术界本身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自主创新的必要性。要维持持续的国际化进程, 学术界和大学必须积极主动地创造和交流知识。¹⁴ 秦东兴对日本文部科学省于 2011 年开始推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项目——“加强大学世界拓展力事业”, 作者分析了该项目的背景和实施, 论证了该政策目前对国家战略发展、完善校际合作交流体系、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和日本学生的国际参与意识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¹⁵

国内外学者对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源、发展和政策的研究朱春楠讨论了韩国高等教育

⁷ 谭诤.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原则及核心指标的讨论[J]. 大学教育科学, 2014(06): 117-120.

⁸ 杨德广, 王勤. 从经济全球化到教育国际化的思考[J]. 教学研究, 2000(04): 289-293.

⁹ 李增森, 赵淑慧. “双一流”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探析[J]. 教学研究, 2019, 42(06): 22-26.

¹⁰ 朱文, 张许.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述评[J]. 高校教育管理, 2017, 11(02): 116-125.

¹¹ Huang F.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3, 7(3): 225-240.

¹² 曾小军.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动因、政策与挑战[J]. 高教探索, 2017(06): 86-90.

¹³ 陈晓清. 日本大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战略——“大学的世界展开力强化事业”战略的启动、运作与成效[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9, 40(02): 28-35.

¹⁴ Yonezawa 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debates and realities[M]//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Springer, Dordrecht, 2011: 329-342.

¹⁵ 秦东兴.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路径——以“加强大学世界拓展力事业”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 2017(03): 72-77.

国际化视阈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方式。解释了韩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的原因、战略与问题。韩国推出了《留学韩国计划》等一系列的策略,来实现缩小教育领域赤字,提高韩国大学排名等目标。Klyong Byun 等研究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政府在其高等教育体系国际化政策的变化模式。研究探讨政府的国际化政策背后的驱动力对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如何影响韩国高等教育和韩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¹⁶

目前国内对中日韩“亚洲校园”计划的研究。刘清伶和李红宇对中日韩联合发起的“亚洲校园”的背景和实施过程以及未来的前景进行了分析。¹⁷郑觅通过介绍中日韩三国实施的多边教育合作项目“亚洲校园”计划质量保障协同的机制、措施和经验以及在联合评估方面的创新举措,提供未来在对外交流合作的新理念。¹⁸

通过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学者们对中日韩三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起源、发展和不足进行了研究,并且研究了三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与政策。但对中日韩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缺乏深层的比较。我国“双一流”战略提出后,目前的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双一流”战略的意义和未来发展的前景,缺少一些具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建议;在 2019 年中日韩成都峰会成功召开的背景下,本篇文章的主要通过分析日韩国国际化战略与政策的成就与不足,与中国的国际化战略与政策作对比,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建议。另外通过分析中日韩教育合作的案例,为下一步的中日韩三国的高等教育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提供建议。

三、中日韩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比较

(一) 中日韩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主要的相同或相似点

1、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发力点推动整个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1) 日本

2014 年日本提出了“顶级全球化大学计划”。选定日本 37 所大学。其中 13 所研究型大学被定为世界“顶级”大学。这些大学制定了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的目标。其余 24 所大学被定为国际化牵引大学,目的引领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2) 韩国

1996 年,韩国政府颁布《向国外开放高等教育市场的初步计划》拉开了高等教育国际

¹⁶ Byun K, Kim M. Shifting patterns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Korean higher educ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 15(5): 467-486.

¹⁷ 刘清伶,李红宇.“亚洲校园”计划:背景、实施过程与前景探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33(04): 54-58.

¹⁸ 郑觅.多边教育合作质量保障协同机制的创新与实践——基于“亚洲校园计划”联合质量评估的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9(03):176-180.

化的序幕。

1999 年，韩国政府开始正式实施了 21 世纪智慧韩国工程（Brain Korea 21, BK21），以下简称 BK21。第一阶段的 BK21 工程，从 1999 年开始实施到 2005 年，在这个阶段，重点培养高水平的研究型人才，将财政的教育经费大量资助这些人才。并且建立高水平的研究机构，与国际高水平大学交流合作。努力在高水平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2006 年，韩国推出了 BK21 工程第二段，主要扩大第一阶段的成果，并且完善第一阶段的不足，第一阶段，由于过度追求学术指标，在教学和产学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且由于财政主要支持是部分重点大学，使得大学与大学之间的研究水平进一步拉大。所以第二阶段，将目标细化。给 20000 名优秀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建立十所全球高水平研究大学。加大产学研的力度，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

2013 年韩国在 BK21 计划第二阶段后，韩国再次推出了 21 世纪智慧韩国一流大学与卓越人才建设工程（Brain Korea 21 Program for Leading Universities & Students）以下简称 BK21 PLUS。该计划的目标是讲 BK21 第二阶段的成果，进一步扩大。该政策会持续到 2020 年。

（3）中国

二十世纪末，中国为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先后提出了“985 工程”和“211 工程”。“985 工程”计划在国际化的方面其主要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其学术地位。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 985 工程之后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进一步的提出建设一流学科。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评价指标是国际化程度，同时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重要的手段也是国际化。

2015 年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该文件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国际化”一词，为未来的国际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4）小结

虽然具体的时间点和国情有所不同，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日韩三国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都采取了“世界顶级研究型大学”的政策，目的是将政府的公共投资集中在这些顶级的研究型大学中，提高这些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改善教育服务贸易对逆差，促进本国的科研水平发展，提高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2、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所使用的政策路径基本相同

中日韩主要实现国际化的战略的政策路径基本相同，主要有留学政策、奖学金政策、国际化师资队伍与课程改革政策和对外交流合作政策。通过这四方面的政策来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

(1) 留学政策

留学的政策主要分为两类，促进本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政策和吸引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政策。明确地把留学生的人数作为政策的目标，一方面为本国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提供资助，另一方面给予外国来到本国的留学生提供资助，吸引他们来到本国留学。

1983 年日本政府推出了“留学生 10 万人计划”。目标是二十一世纪时，招收十万名国际留学生。

日本文部科学省于 2008 年启动了“全球 30 国计划”。它的目标是到 2020 年招收 30 万外国学生。

2004 年，韩国出台《留学韩国计划》，目标在 2010 年招收 5 万名留学生。

2012 年，韩国政府再次出台了关于吸引留学生的文件《留学韩国计划发展方案》，目标是在 2012 年吸引 10 万名留学生。同年，韩国政府出台《高等教育国际化推进战略》，目标在 2020 年，招收 20 万名留学生赴韩学习。

2010 年 9 月中国教育部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2010—2020 年）》，目的是全年在内地高校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 15 万人，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

(2) 奖学金政策

日本成立独立行政法人机构来单独管理日本留学生事务，细化奖学金的类别，形成一套完善的奖学金政策，此外日本每年都提供一定的全额奖学金的名额，为品学兼优的留学生提供经济支持。

韩国政府给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了种类丰富的奖学金。政府设立了 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来给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持，涉及的种类如全球韩国奖学金 Global Korea Scholarship (GKS)、韩国政府留学生志愿计划、自费支援计划、合作伙伴国家学生的 GKS 邀请计划、东盟国家理工科学学生的 GKS、GKS 非洲和拉丁美洲学生暑期课程、(韩语)海外留学生奖金和韩日联合高等教育学生交流项目。¹⁹ 2013 年，GKS 的预算为 6 05 亿韩元。2015 年，这个数字超过了 1000 亿韩元。

¹⁹ https://www.studyinkorea.go.kr/en/sub/gks/allnew_invite.do

中日韩经济合作

韩国政府还成立了 KOICA (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KOICA 是一个公共企业,旨在帮助本国留学生赴海外留学和邀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来韩留学。学院自主招收外国留学生攻读硕士学位,并提供全额奖学金。同时,挑选想要出国留学的韩国学生。扩大韩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1994 年,中国建立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设置该机构的目的,一方面政策是为了给赴海外留学的学子更好的经济保障,更重要的是规范公派留学的政策和学生选拔的政策,遏制人才流失,更好的建设中国。

(3) 教学与课程改革政策

中日韩都引进外国教材、英语课程和双语课程的设置和提供与国外大学合作的跨国项目,以及海外研究机构和本国的大学的合作。²⁰并且构建国际化高水平的师资科研队伍。

200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选择了 30 所重点大学推出了“Global 30”事业,将这三十所大学作为国际化大学进行重点建设。财政的资助更偏向于英语的教学,设置了约 150 个全英授课双学位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七个国家设置合作联络基地。

2008 年,韩国教育部推出 WCU (World Classic University) 项目,目的是通过吸引全球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来到韩国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队伍,并着力提高大学的科研与教学水平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主要有三个措施:1. 建立新的学院和特别的专业。2. 在学术项目中聘请外国学者。3. 邀请顶级大师(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访问至少两个月。

2008 年,中国开始实施“千人计划”,鼓励海外的科研人员回国开展研究工作。通过鼓励性政策吸引高层次的国际化科研和师资人才。1998 年推出的“教育部长江学者”也属于此类政策。

(4) 对外交流合作政策

日本文部科学省 2011 年推出“大学拓展力事业”。大学扩展力事业是日本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区域合作项目。其中合作的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南美、美国、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等地区。在这些项目中,就包括中日韩合作的“亚洲校园”项目。

韩国 2011 年 11 月 30 日,在 ICI-ECP 计划框架内发布了关于联合出行项目(JMP)和联合学位项目(JDP)的征集建议书。ICI-ECP 计划促进了欧盟与北美,亚太地区和海湾地区的

²⁰ Yang, Rui. China's Strategy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 Overview[J]. 中国教育学前沿, 2014, 9(2):151-162.

17 个工业化国家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²¹

中国教育部 1995 年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政策性基础。2004 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构建了合作办学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已与 188 个国家和地区、46 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 54 个国家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如《中法教育交流协定》、《中德关于项目承认高等教育等值的协定》。这对下一步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中日并未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3、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相似

（1）都面临“教育贸易逆差”的问题

由于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整个社会出现了老龄化的问题，反应到高等教育方面，反映出了学费不足的问题，又由于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占整个高等教育的绝大多数，日本为了增加其学费收入，就需要不断的扩大其海外市场。

韩国与日本一样也面临高等教育的“赤字”。但其原因与日本有所不同，韩国主要是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韩国学生会选择出国留学。外国留学生愿意前往韩国留学的却很少。在“贸易逆差”情况下，由于出生率低造成的“内需”不足，导致私立化的学校难以为继，公立学校给财政造成很大压力。这种情况，一方面加剧了贸易逆差的问题，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加重人才流失问题。

中国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且绝大多数前往学费高昂的西方国家，来中国留学的人数和学费都远低于前者，所以中国在经济数字上的逆差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才流失的问题。1985 年，中国取消了自费留学资格审查，出国留学迅速升温，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不按时回国的现象。为了改善这种现象，我国建立了长期留学回国的机制，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有许多优秀学生，选择毕业以后，留在发达国家工作和生活，也对我国的发展是个很大的损失。

（2）都面临语言障碍的挑战

中日韩地处东北亚地区，语言体系与西方国家十分不同，所以中日韩的英文水平没有优势。日本在英语教育方面由于其自身日语发音问题，以及基础阶段过于注重学生的读写能力，而忽视学生的听说能力，导致日本学生，整体在高等教育阶段缺乏使用英语进行沟通的能力。中国由于应试制度，导致大部分同学的听说能力不达标，大多数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很难适

²¹ <https://europlan.pixel-online.org/news.php?id=86>

应英语授课。²²另外日本的语言障碍也与其低的出生率有关，低的出生率降低了在国内教育体系内的竞争，学生们不愿意参与到竞争导向的学习当中去。这种现象在日本这种中等规模国家是十分明显的，这导致整个教育体制下的学生，都只说日语这种本土语言。这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十分不利。

在吸引外国留学生方面，由于中日韩的语言障碍，所以外国留学生除了主要学习语言和文化的留学生以外，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语言劣势。且国际化需要建立全英文授课的课堂，由于语言的问题，会对课堂的质量造成负面的影响。

（3）没有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主导权

目前世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由美国和英国为首所主导的，他们在高等教育中占有巨大的优势并且拥有规则制定的优势。中日韩地处东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与西方国家的竞争力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何缩小教学、文化的差距，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是中日韩三国共同的挑战。

（二）中日韩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主要的不同点

1、高校发展国际化时的自由度不同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占整个高等教育的绝大多数，韩国同样私立大学占据整个高等教育的主体。除了私立大学所占比重不同，私立学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上更有活力，如韩国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的建校理念就是国际化。而我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及研究生以上的高校是以公立教育为主，而且高水平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所以政府给予高校的政策发挥的自由度是不同的。日韩政府给予各个高校的国际化自主权要大于中国，各个高校特别是私立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和学科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政策。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主要是根据教育部所下发的文件进行执行，在一些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学校，需要教育的政策对其倾斜和扶持。

2、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度不同

由于日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源于经济的全球化，日本也就一些大学正在追求名义上和形式上的国际化，如一些大学增设国际部门，只提供商务英语课程和象征性地聘请外籍教师。目的是拥有“国际化”标签可以吸引更多的生源，不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日本也推出了一些政策帮助留学生深入的融入日本的社会：设置专门机构促进来日留学生就业，通过灵活运用实习工作、扩大就业咨询窗口等方式加强对就业的支持。同时要求企业改革接纳体

²² 曾小军.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动因、政策与挑战[J]. 高教探索, 2017(06): 86-90.

制，接纳留学生等。²³

韩国在吸引留学生方面也出现了合作层次较浅的问题，《留学韩国计划》《留学韩国计划发展方案》。两个计划总计吸引 15 万名留学生赴韩国学习。2012 年推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推进战略》目标在 2020 年招收 20 万名来韩留学生。韩国在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为了吸引留学生，扩大招生规模，这就导致了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韩国降低了到韩国留学的入学标准，对留学生的管理也较松。导致出现了大量留学生无法适应生活，无法完成学业，甚至出现了以留学为名义来韩国打工的一些违法行为。虽然在这些政策中，外国人被允许攻读某些学科的博士学位，但专业选择受到限制。²⁴

中国为了更好的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度，中国不仅将外国人“引进来”，还主动地“走出去”，在境外创办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培养汉语国际化人才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非盈利性的汉语教育。截止到 2019 年，孔子学院已经遍布全世界 162 个国家，作为高等教育的孔子学院已经有 550 所。通过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学员已经超过了 1000 万。孔子学院为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留学起到了巨大作用。²⁵不过目前世界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抵制孔子学院的现象。美国曾经对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进行审查，并且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 2014 年宣布终于与孔子学院的合作。2015 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宣布关闭孔子学院。“走出去”的战略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中国出现了对外合作交流停留在浅层的现象，目前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和学者都非常愿意来中国讲学与中国合作，但这些顶级的科学家来到中国的合作仅仅做一个讲座或者开一个小型的论坛或者学术会议，原因是中国会给这些科学家高额的出场费，但这些顶级科学家很难留在中国进行科研，在科研过程中，培养中国的研究生。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只是加大对外国学者的待遇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积极调整内在的教育结构 and 经济结构。

3、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国的结合程度不同

日本是中日韩三国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最为紧密的国家，日本的“诺贝尔奖计划”虽然不属于具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已经有 19 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无疑对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诺贝尔奖计划”

²³ 齐小鹏.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 演进与趋势[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18, 7(03): 43-48.

²⁴ Krechetnikov K, Pestereva N, Rajovic G.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J]. Europe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2016, 16(2): 229-238.

²⁵ 牛康侃, 陈德敏. 孔子学院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借鉴意义[J]. 海外华文教育, 2017(09): 1276-1282.

中日韩经济合作

是在 2001 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的。文件指出：“日本要力争在未来的 50 年里，让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达到 30 人”。在 2005 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再次提到了这一目标。该项目的成功，为日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奠定了学术基础。

日本的高等教育除了重视基础的学术研究，也注重产学研的结合，2002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 2002 推出 COE (Center of Excellence) 高等教育国际化项目。对日本重点公立、私立大学的重点学科进行资助，允许高校创办企业。目的是建成世界高水平研究基地，通过研究基地的发展来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注重产学研的结合。

相对来说，中韩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中与本国的结合存在一些问题。

SCI 是全球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之一，1980 年代，SCI 被引入到中国，成为了中国科研论文的主流的评价标准。这个找准的设定，帮助了中国科学学术与世界接轨，提高了中国学术的水平，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但在中国，这个标准滋生出了职称评聘、学位授予、人员聘用的“SCI 至上论”。SCI 策略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是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提高了整体的学术水平，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高了中国高校在世界级榜单上的排名。但是这种评价制度造成了功利化的问题，引起了学术不端等问题的发生。

相对于中韩的“唯 SCI 论”，日本没有很多竞争指标，再加上日本的科研支持政策，使得日本学者愿意扎根本土，给学者们回归学术的初心提供了机会。

在韩国，21 世纪智慧韩国一流大学与卓越人才建设工程中，韩国大学想要获得政府的补贴，就必须参加这些工程。这些工程设置很大比重的国际化指标。通过满足所规定指标来获得政府补贴，以此推进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²⁶在国际化学术指标方面过分追求 SCI 文章的数量，导致了教学水平的下滑和产学研之间的脱节，高等教育国际化出现了功利化的问题。

四、中外合作办学与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

(一) 双边中外办学模式

改革开放前，我国缺乏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经验，但是中外合作办学，能够快速的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缩小与国外的差距，所以国家十分重视国际化的合作办学。1993 年，天津财经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开办了第一个中外合作项目。1995 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中外合作办学是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形式。2003 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2009 年教育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明确对中外

²⁶ 魏玉亭, 高长完. 韩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 动因、战略与挑战[J]. 比较教育研究, 2019, 41 (06) :67-74.

中日韩经济合作

合作办学的高校进行质量评估，提高办学的质量。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合作办学领域，发展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化合作能力的院校，成功的案例有：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各校自主创建的“3+1”、“2+2”等培养模式，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合作的发展。

（二）双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出现的问题

1、政策对实践的支撑不足

由于我国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缺乏实践经验，所以我们的理论水平落后于实践水平，在政策制定上存在一定的漏洞，制定的规范和细则，在落实的过程中与各个院校实际的情况有所出入，所以政策执行的效果有折扣，每个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一套统一的体系。

2、中外合作办学认可度不高

虽然在政策层面，国家要求与国外一流大学的优势专业进行合作，但是合作项目的水平却是参差不齐和高昂的费用，导致很多学生和家长不愿意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难以保证生源的质量。当培养的学生毕业时，在找工作时，中外合作办学的学历在用人单位认可度也不高，一方面在于知名度，另一方面也与培养出的学生无法适应工作需要有关。

3、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分布在东部和西部分布不均

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西部地区很少。但主要是由于我国本身的高等教育模式和经济结构决定的。

（三）多边高等教育合作探索——中日韩亚洲校园

1、亚洲校园计划的背景

“亚洲校园”是中日韩之间的一项跨境学生流动计划，是由韩国、日本和中国在 2010 年举行的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发起的。该计划旨在加强亚洲高等教育学术机构之间的网络，并通过联合和双学位项目及交流项目促进学生交流。

受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中日韩关系的发展，为中日韩教育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虽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既有地缘共性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却由于历史发展呈现出显著差异，在社会制度、语言文化、民族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加之语言之间并不互通。给“亚洲校园”项目的合作带来了挑战。

2、亚洲校园计划的历史

2010.05 在韩国举行的第三届朝、日、中峰会上采用校园亚洲试点项目作为新的合作项目。

2012~2015 年中日韩校园亚洲试点项目实施（10 个项目）

中日韩经济合作

2016.01 中韩教育部长第一次会议同意将试点项目扩大范围。

中日韩三国在首尔召开了第一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三国教育部长在韩国首都首尔签署了《中日韩三国教育合作首尔宣言》。强调了三国教育合作的重要性。宣言中，明确指出了建立三国大学生的交换计划。通过“亚洲校园计划”进行拓展，努力建设全亚洲的教育合作，构建亚洲教育共同体。

2016.10 校园亚洲全面项目启动

2016.12 校园亚洲启动仪式暨首届三边校长论坛

2017.11 中日韩促进大学交流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3、亚洲校园计划的项目

“亚洲校园”突破了传统的双边教育合作，突破了中日韩的地缘政治、社会制度、文化和语言的界线，建立了一个具有多边性和多样性的具有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亚洲校园计划的合作项目从首批的十个项目，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十七个。合作的项目类型既有短期交流，又有硕士交换和硕士项目双学位等类型。

表 1-1 亚洲校园现有项目

	中国	日本	韩国	项目主题
1	复旦大学	神户大学	韩国大学	东亚地区的风险管理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立命馆大学	同修大学	东亚地区的人文科学
3	上海交通大学	九州大学	釜山大学	能源与环境科学与技术
4	北京大学	一桥大学	首尔大学	亚洲商业领袖计划
5	北京大学	东京大学	首尔大学	BESETO DDMP 国际和公共政策研究
6	吉林大学	冈山大学	成均馆大学	东亚共同利益的实现与古典 文化的重估
7	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名古屋大学	成均馆大学/首尔 国立大学	法律与政治学
8	清华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韩国科学技术院	科学技术
9	北京大学	早稻田大学	韩国大学	东亚地区多层次冲突与社会 创新全球计划

中日韩经济合作

10	同济大学	九州大学	釜山大学	培养人才的合作教育计划
11	北京大学	东京大学	首尔大学	BeST 区域专家教育项目
12	北京师范大学	东京大学	首尔大学	东亚地区教师教育国际研究生课程
13	山东大学	长崎大学	成均馆大学	中日韩校际合作项目
14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天津大学	大阪大学	延世大学	医学与公共卫生计划
15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千叶大学	延世大学	植物与环境创新计划
16	中国传媒大学	东京大学艺术学院	韩国艺术学院	日中韩国际动画合作课程
17	上海海洋大学	东京大学	韩国海事大学	海洋科学与技术合作

（四）亚洲校园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

中日韩“亚洲校园”不是简单的两两合作的模式，而是更加强调三边协同合作，共同开发课程，共同组织活动，每个项目都有三个国家的优质大学共同参与。²⁷ 实践了多边高等教育合作的新模式。

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中国教育部成立了“亚洲校园”专项基金，为项目提供资金和奖学金；中日韩联合创建统一跨国机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对项目进行监管，推进大学生交流、学分互换认定、授予学位等工作的进行；由中日韩三方制定统一的评估标准；所有参与项目的学校参与自评自查，然后共同撰写自评报告；中日韩共同排除专家小组对项目进行现场评估。²⁸

五、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建议

正确的使用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的标准对于正确的改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具有共性的核心标准有六项，理念与战略、学生流动、师资队伍、教学与课程、科研成果和对外交流与合作。通过我们本文前面部分的中日韩高等

²⁷ 陈晓清. 日本大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战略——“大学的世界展开力强化事业”战略的启动、运作与成效[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9, 40(02): 28-35.

²⁸ 郑冕. 多边教育合作质量保障协同机制的创新与实践——基于“亚洲校园计划”联合质量评估的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03): 176-180.

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总结，我们用这六个评价标准来进行政策建议。²⁹

（一）理念与战略

坚定不移的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坚持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战略。继续坚持以高水平学术发展带动整体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研究的方向更应该注重基础创新性学科。由于一些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本质上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本身和我国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如顶尖科学家很少愿意在中国长期进行科研和任教和中外合作的机构和项目在东西部的分布不均。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时与我国自身高等教育政策和经济结构相适应。

（二）学生流动

在学生流动方面，今后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对于从中国想要去国外留学的学生，要优化留学的服务，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两种方式同时发展。公派留学主要针对的主要国家紧缺的战略型人才。在科学方面是针对“卡脖子”技术相关领域的学科，和战略发展相关的学科。在人文方面优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³⁰

针对自费留学的发展，要优化其服务水平，为自费留学生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³¹最后对于国外留学的学生我们还要建立吸引机制，防止人才的不断外流。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科研能力和文化在世界上越来越有影响力，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国际留学的中心国家。未来世界各国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会不断的加大。我们不仅要扩大来华留学的规模，更要注重来华留学的质量，严格把控来华留学生的标准，把控留学生教学的质量。

（三）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在双一流《总体方案》中被放在五项主要任务的首位。首先要提高我国本土师资的英语授课水平和学术科研水平，同时吸引外国优秀师资来中国任教，帮助他们解决在中国的生活问题，提高外籍师资在中国的待遇。建立引进人才的体系，如果是对我国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的人才，可以允许其加入中国国籍。走出去方面，要以孔子学院为依托，培养对外汉语师资要加大储备力度。

²⁹ 谭铮.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原则及核心指标的讨论[J]. 大学教育科学, 2014(06):117-120.

³⁰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9/c_1118775049.htm, 2019-09-23.

³¹ 张梦琦, 刘宝存. 新时代我国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政策走向——基于《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解读[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01):25-32.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中，处于教学和科研的核心位置的是研究生导师。建立一支优秀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对我们的学术提高和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

（四）教学与课程

在教学和课程方面，我们要建立国际高水平的课程资源。提高英语授课课程比例，英语是全球学术界通用的语言，为了提高学术水平和国际化课程的质量，提高英语教学课程的比例和质量，是下一步中国高等教学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学科方面，以构建世界一流学科为依托，在目前我国急缺的自然科学领域完善课程内容，优化培养方案。在面向留学生的课程中，我们除了要提供优质的英文类专业课程以外，还要提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课程。特别是汉语、中医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课程要不断优化，让国外的留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

（五）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方面，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国际期刊的论文篇数上在国际上名列前茅。这得益于我国具有竞争性的科研人员评价体系。但这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如教师轻教学重科研，缺乏一些基础性学科的创新性成果和高科技领域的创新性成果。下一步科研成果政策的努力的方向，更多是让学者回归学术的初心，在涉及国家战略领域的研究中有所突破。学术方面目前我们更应该引导学者回归学术的本心。努力培养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强产学研的结合。

（六）对外交流与合作

1、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政策建议

国家把控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的大方向，给予符合国际化条件的一流大学一定的自主权来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工作，这样能有效的避免统一的政策不能支撑条件不同的大学的国际化需要。建立完善的国际化合作体系，填补政策上的空缺和偏差。给予高校关于合作办学政策上的激励政策。加强与更多的国家的合作，让更多国家的学位可以在中国得到认证。

2、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建议

在亚洲校园的基础上，吸取成功经验，探索多边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的新模式，努力扩大合作范围，早日与日本签订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从中日韩探索到东盟十国 10+3 的合作，乃至从亚洲到世界的高等教育多边合作。

六、参考文献

1. Kreber, C.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J]. 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 Learning, 2009, 10(118) : 1 — 14.
2. Yonezawa 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debates and realities[M]//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Springer, Dordrecht, 2011: 329-342.
3. Knight, J. (2003). Updated internationalisation definiti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33, 223.
4. 龚放, 赵曙明. 大学国际化——高等教育发展趋势[J]. 高等教育研究, 1987(4):29-35
5. 张寿松.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十个基本问题[J]. 高教研究与实践, 2003.
6. 谭诤.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原则及核心指标的讨论[J]. 大学教育科学, 2014(06):117-120.
7. 杨德广, 王勤. 从经济全球化到教育国际化的思考[J]. 教学研究, 2000(04):289-293.
8. 李增森, 赵淑惠. “双一流”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探析[J]. 教学研究, 2019, 42(06):22-26.
9. 朱文, 张许.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变迁述评[J]. 高校教育管理, 2017, 11(02):116-125.
10. Huang F.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3, 7(3): 225-240.
11. 曾小军.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动因、政策与挑战[J]. 高教探索, 2017(06):86-90.
12. 陈晓清. 日本大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战略——“大学的世界展开力强化事业”战略的启动、运作与成效[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9, 40(02):28-35.
13. Yonezawa 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debates and realities[M]//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Springer, Dordrecht, 2011: 329-342.
14. Byun K, Kim M. Shifting patterns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Korean higher educ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 15(5): 467-486.
15. 刘清伶, 李红宇. “亚洲校园”计划:背景、实施过程与前景探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2, 33(04):54-58.
16. 秦东兴.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路径——以“加强大学世界拓展力事业”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 2017(03):72-77.

17. 郑颢. 多边教育合作质量保障协同机制的创新与实践——基于“亚洲校园计划”联合质量评估的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03):176-180.
18. Yang, Rui. China's Strategy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 Overview[J]. 中国教育学前沿, 2014, 9(2):151-162.
19. Krechetnikov K, Pestereva N, Rajovic G.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J]. Europe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2016, 16(2): 229-238.
20. 齐小鹏.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演进与趋势[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18, 7(03):43-48.
21. 牛康侃, 陈德敏. 孔子学院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借鉴意义[J]. 海外华文教育, 2017(09):1276-1282.
22.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9/c_1118775049.htm, 2019-09-23.
23. 张梦琦, 刘宝存. 新时代我国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政策走向——基于《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解读[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01):25-32.

第二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日经济合作概况

郭欢 李维凯³²

【摘要】中日经济合作在双城经济圈的开展获得了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促进力量推动，正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篇章。为具象地展现中日经贸合作在该地区的发展情况，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以及通过网络公开渠道获取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初步将双城经济圈中的中日经济合作交流进行了不完全统计和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双城经济圈、中日经济合作

一、引言

202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下简称“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与此同时，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出席，就中日韩合作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会议中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对于促进中日韩在双城经济圈的合作共赢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日经济合作在双城经济圈的开展获得了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促进力量推动，正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篇章。为具体地展现中日经贸合作在该地区的发展情况，作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以及通过网络公开渠道获取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初步将双城经济圈中的中日经济合作交流进行了不完全统计和简单的梳理，以供各位参考。

二、双城经济圈

（一）双城经济圈概述

双城经济圈由成都市和重庆市两大中心城市及四川省内其他位于城市圈绵延区的城市组成。

1. 成都

³² 郭欢，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业务领域为外商投资、企业合规、海关与外汇等。
李维凯，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业务领域为外商投资、企业合规。

中日韩经济合作

2019 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 17012.65 亿元，利用外资实际到位 131.69 亿元，进出口总额 5822.7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5878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37 元。成都正在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以及国际综合交通通信枢纽。

2. 重庆

2019 年，重庆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23605.77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103.1 亿美元，进出口总值 5792.78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939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133 元。重庆正在紧紧围绕国家重要中心城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等国家赋予的定位，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二）双城经济圈与中日经济合作

成都市日资企业共 370 家（截至 2019 年 1 月），常驻成都的日本人共 460 人（截至 2019 年 10 月），主要涉及汽车等运输设备、IT 及电子相关、零售相关企业等。与此相对，重庆市日资企业共 160 家（截至 2019 年 1 月），常驻重庆的日本人共 350 人（截至 2019 年 10 月），主要涉及汽车、机械、IT、测量器械、环境技术、金融、零售、物流等行业。

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日本商工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中经济协会等日本企业机构非常重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尽最大可能扩大日本同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合作。

三、日本企业投资双城经济圈的利好

（一）国家战略支持

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党中央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动力源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属于重大国家战略，政府将着力把双城经济圈打造成为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日本企业在本地投资的便利性。

（二）本地大力推进中日合作

自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来，双城经济圈以成都为首，从政府到民间自上而下地积极推进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大力促进日本企业到本地投资，开展了一系列的经贸交流活动（具体详见本章第四、五节内容）。

（三）本地中日合作由来已久

截至 2020 年 2 月，成都、重庆两地实际利用日资已达约 37 亿美元，汽车制造、电子产业、城市建设、食品饮料等诸多领域。并且，计划在成都、重庆扩大投资的企业分别约占总

数的 52.9%、45.5%。

（四）促进政策

除了国家层面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7 年修订）》以外，成都作为外商在中国西部投资的重点区域，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由四川省、成都市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法规政策，例如《四川省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政策规定》、《关于印发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成都医疗美容产业发展规划（2018-2030 年）》、《关于加快成都市成都医药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成都市工业发展布局规划纲要（2003 年—2020 年）》。

（五）自贸区

包括成都天府新区片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川南临港片区三个部分在内，总面积 120 平方公里的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四川自贸区”）作为第三批自贸区之一，于 2016 年 8 月由国务院获批后，正在稳步建设中。

与此相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同年 3 月 31 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同年 4 月 1 日正式挂牌。

（六）交通便利

1. 成都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跻身全球前 50 最繁忙机场行列，2019 年旅客吞吐量达 5586 万人次，位居全国第四。货邮吞吐量 67.2 万吨。其中国际及地区货邮吞吐量 14.6 万吨，增长 10.2%。另外，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预计 2021 年投入使用，将满足 9000 万人次的年旅客吞吐量、200 万吨货邮吞吐量。并将成为国内第三座拥有双机场的城市。

成都拥有亚洲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蓉欧班列中线开行至波兰罗兹、德国纽伦堡、荷兰蒂尔堡，南线开行至中亚、土耳其，北线开行至俄罗斯。成都正在打造国家高铁枢纽城市，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辐射欧亚的国际性铁路枢纽，构建至重庆 1 小时，至武汉、西安、贵阳、昆明、长沙、兰州、西宁 4 小时，至北京、上海、广州 8 小时交通圈。

2. 重庆

江北机场拥有客运基地航空公司 6 家，开通航线 260 余条、通航城市 160 余个。其中，国际（地区）航线 61 条、通航城市 48 个。国际（地区）货运通航城市 12 个，包括北美洲

中日韩经济合作

芝加哥、安克雷奇，欧洲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莫斯科，大洋洲悉尼，亚洲首尔、新加坡、曼谷、河内、香港、台北等地。机场目前年货邮吞吐量接近 40 万吨，国际（地区）货量占比达到 30%以上。

四、成都中日经贸合作情况

（一）成都中日经贸合作概述

日本是成都第五大贸易伙伴。2019 年成都与日本进出口总额达 314.8 亿元，全市利用日资实际到位资金 19.61 亿美元。日本在成都累计投资企业 326 家，其中 38 家是世界 500 强企业。

截至 2020 年 8 月，四川已与日本广岛、山梨县、和歌山县等地建立各级友城 12 对。日本在川累计设立投资企业 467 家，包括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三菱化学、出光、思佰益等知名企业，投资行业涉及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金融业服务等。2020 年四川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中，对日本进出口 354.2 亿元，增长 26.2%，四川已成为对日经贸合作大省，对日投资、贸易位居中国中西部地区前列。

（二）地方具体经贸往来

以 2018 年 5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与日中经济协会前述的《深化中日地域经济交流合作备忘录》以及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契机，成都市各级人民政府围绕促进中日在成都的经贸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主要活动情况如下：

表 2-1 成都市中日经贸交流活动统计表

序号	日期	主要负责 部门/机构	活动	主要内容
1	2018 年 5 月	四川省政府	四川省尹力省长赴日访问	与日中经济协会签署《深化中日地域经济交流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四川共建中国（四川）日本产业园。
2	2018 年 8 月 28-31 日	四川省政府	中国（四川）—日本经济合作顾问委员会座谈会、中国（四川）日本经贸推介会、四川—广岛企	向日本有关机构和企业推介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中日韩经济合作

			业交流对接会、中国四川(大阪)经贸推介会	
3	2019 年 4 月 17 日	成都市高新区政府	中国(四川)日本产业合作园推介会	围绕加强中国(四川)日本合作产业园国际营商环境建设、产业生态圈打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4	2019 年 8 月 22 日	成都市高新区政府	中国(四川)日本产业合作圆桌论坛	规划选址成都高新区的中国(四川)日本产业园,正在打造升级为国家级产业合作平台。
5	2019 年 12 月 2 日	成都市高新区政府	“携手新视界”超高清视频产业中日交流合作大会	围绕 5G 时代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发展及创新应用进行演讲、对话,探讨产业现状、解决方案及商业前景。
6	2019 年 12 月 20 日	成都市高新区政府	中国(四川)日本产业合作项目研讨会	围绕地方合作、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科技创新、经贸文化等开展讨论研究和务实合作。
7	2020 年 5 月 12 日	成都市武侯区政府	城市更新引领、创意设计赋能——成都市武侯区城市设计产业中心全球招商推介会	邀请日本城市设计产业链上的企业参与武侯城市设计产业中心的孵化建设。有包括四川中日友好会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中经济协会、日本陕西总商会、日建设计、野村贸易、慈度新葵在内的日本机构和日资企业参会。
8	2020 年 5 月 20 日	成都市高新区政府	中日产业合作线上推介会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在会上正式挂牌。
9	2020 年 7 月 1 日	成都市新都区政府	2020 新都中日线上投资贸易推介会	新都区首次发布了《新都区中日合作(成都)城市建设和现代化服务业机会清单》,助推资本与合作项目对接,促进更多中日合作技术、项目在新都孵化落地。
10	2020 年 7 月 14 日	成都市政府	“共享新机遇”系列活动-2020 成都对日开放合作推介	推介活动以科研技术服务、健康服务领域为主题,向参会日资企业分享了城市发展机遇。

中日韩经济合作

			活动	
11	2020 年 8 月 28 日	成都市政府	成都交子公园商圈项目合作大会暨全市服务业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共同关注与探讨成都交子公园商圈投资与展会机会
12	2020 年 9 月 25 日	成都市政府	2020 国际双城链云对接	与日本前沿科技企业展开一场创新对话，进一步推动成都与日本东京城市建立科技合作，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新型国际双城云合作模式，推动全球创新科技资源要素汇聚成都，赋能成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2020 年 10 月 12 日	成都市政府	中日生态环保合作暨环保产业投资推介会	围绕成都市投资环境、成都生态环保产业、日资环保企业技术等情况进行了推介、洽谈和主题研讨。
14	2020 年 10 月 20 日	成都市政府	2020 中日韩(成都)中小企业经贸创新峰会	围绕新经济、健康服务、跨境电商等领域展开交流合作。
15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成都市政府	知名日资企业四川行交流座谈会	促进中日合作共赢，带动更多企业到四川考察。

(三) 重点合作项目

在成都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日经贸合作在成都市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正在进行的重点项目主要如下：

表 2-2 成都市中日经贸合作重点项目统计表

序号	项目	所在区域	项目定位
1	中国(四川)日本合作产业园——高新南区	成都市高新区	与日本进行动漫产品创意与技术、IP 本土化二次开发与市场运营、版权代理海外发行、强 IP 品牌营销与衍生品设计制造、供应链资源服务等合作，同时，一道发展智能信息技术、生产管理软件及智能工厂技术。
2	中国(四川)日本合	成都市高新区	以全球性枢纽经济领航者为定位，通过港产城融合、

中日韩经济合作

	作产业园——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		多业融合、跨域融合，打造临空产业体系，重点发展：航空产业（航空物流、民航科创、航空枢纽服务、航空维修等）、临空现代服务业（商业贸易、文化体育、康养等）、临空新经济产业（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
3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瞪羚谷片区	成都市高新区	位于锦城湖畔、剑南大道两侧，重点发展动漫游戏、数字媒体、文化会展、文化商业、文化科技等产业细分领域。
4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骑龙片区	成都市高新区	位于高新南区西南部，剑南大道与天府五街交汇区域，重点发展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文化贸易、文化金融等产业细分领域。
5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未来科技城片区	成都市东部新区	位于成都东南部，龙泉山以东，重点发展航空经济、文化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细分领域。
6	武侯城市设计产业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	以文创产业为主导产业，聚焦创意演艺、创意设计、创意策划三大细分领域，打造具有全球美誉度的三国文化消费目的地。
7	中日韩示范产业园	成都市双流区	产业园内包含国际合作新城、国际空港商务区、保 B 物流园区、国际文体数媒园、天府国际生物城、国际康养小镇 6 个规划园区。
8	成都天府科创生态环境产业研究院	成都市	将在生态环境领域人才建设、政策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交流合作、创投孵化等方面开展合作。
9	中日（天府眉山）国际康养城项目	眉山市	位于天府新区眉山片区，总占地面积约 2500 亩，项目总投资约 300 亿元，
10	其他	成都市	伊藤洋华堂 BPO 中国区总部项目、中日动漫街区、A8 国际音乐产业基地、日本 DAC 西南总部及亚太创新中心项目、思佰益（中国）西南地区总部项目、美刻生活馆西南总部项目、食享会西南总部项目等。

五、重庆中日经贸合作情况

中日韩经济合作

（一）重庆中日经贸合作概述

截至 2020 年 2 月，日本累计在渝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80 家，累计实际利用日资 18 亿美元，五十铃、川崎、发那科等众多知名企业在重庆开展业务。³³

（二）地方具体经贸往来

相比成都，重庆地区的中日经贸交流活动相对较少，但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均保持了一定的经贸往来。具体如下：

表 2-3 重庆市中日经贸交流活动统计表

序号	日期	主要负责 部门/机构	活动	主要内容
1	2018 年 3 月 15 日	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	中日（重庆市）老龄 产业交流会	加深中国企业对日本介护服务，辅助器具及 用品的了解，并共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养 老服务合作模式。
2	2018 年 7 月 13 日	重庆（中美） 海吉亚肿瘤 医院	中日国际诊疗中心 揭牌仪式	重庆（中美）海吉亚肿瘤医院与日本藤田保 健卫生大学附属医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同 时揭牌成立“国际诊疗中心”。
3	2019 年 5 月 29 日	重庆市政府	重庆—日本经贸交 流恳谈会	为实现双方更高水平互利合作搭建更多交流 平台。
4	2019 年 5 月 8 日	重庆红瑞健 康产业（集 团）有限公 司	中日（重庆）养老产 业国际合作交流会	加深中国企业对日本介护服务、辅助器具及 用品的了解，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尤其是内陆 地区的养老服务模式。
5	2019 年 5 月 28 日	重庆市两江 新区政府	中日（重庆两江）大 地生物医药产业园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	将共同搭建中日（重庆两江）大地生物医药 产业园。
6	2019 年 7 月 10 日	重庆市两江 新区政府	中日产业合作论坛	赴日参加中日产业合作论坛并开展系列招商 对接活动。

³³ 《“云”上促合作！重庆向在渝日韩企业抛“橄榄枝”》，2020 年 4 月 15 日，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1988438334_7685293e019001kw9.html?from=news&subch=onews，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中日韩经济合作

7	2020 年 4 月 15 日	重庆市政府	重庆市商务委与日本、韩国驻华经贸机构交流会	就在渝日韩企业复工复产和创新发展、共同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加强双方经贸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沟通。
---	-----------------	-------	-----------------------	--

(三) 重点合作项目

重庆地区已完毕或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主要如下，相比成都，重庆地区的中日合作以民间企业为主导的项目居多。

表 2-4 重庆市中日经贸合作重点项目统计表

序号	项目	所在区域	项目定位
1	中日改善大气环境示范研究项目——重庆餐饮油烟深度治理项目	重庆市	由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牵头，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具体组织实施的国际间交流项目。
2	中日(重庆两江)大地生物医药产业园	重庆市	引入日本创新医药项目入渝发展，对接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科技、专业服务、社会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源，加快医学成果转化，使国际国内先进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科研成果能够快速高效地实现产业化。
3	中日国际诊疗中心	重庆市	加强国际医学学术交流、提高国内肿瘤治疗水平。

六、总结

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的提出以及中日韩三国经济往来的不断加强，可以预想日本企业在双城经济圈的紧密合作将会是整体趋势。虽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传播等诸多问题、困难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从双城经济圈（尤其是成都地区）对于中日合作的积极态度来看，中日两国政府、民众对于增进双方经贸合作以达成互利共赢新局面的基础动力始终存在。笔者作为长年深耕涉及两国的法律实务工作的一线人员，将持续关注两国经贸合作发展，为促进中日在双城经济圈的良好快速发展尽绵薄之力。

七、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020年10月16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0/16/c_1126620405.htm?baike，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2. 《李克强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19年12月24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premier/2019-12/24/content_5463599.htm，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3. 《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0年白皮书》，中国日本商会，2020年，第355、361页。
4. 《日本驻重庆总领事渡边信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发展成中国的第四个增长极》，2020年8月6日，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http://sc.cri.cn/n/20200805/d7381e70-2a09-9bfc-d989-7817cb28e3ba.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5. 《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0年白皮书》，中国日本商会，2020年，第355、361页。
6. 《成都国际铁路港全力赋能西部高水平开放发展》，2020年7月2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465/10595/2020/7/27/c2083bbad11541d0b543b534d65283d4.s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7. 《知名日资企业组团入川！聚焦“双城经济圈”战略机遇》，2020年10月29日，人民网-四川频道 <http://sc.people.com.cn/n2/2020/1029/c345167-34382221.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9日。
8. 《尹力率团在日本交流访问》，2018年9月1日，四川日报，<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797/2018/9/1/10458076.s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9.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在东京举行中国（四川）日本产业合作园推介会》，2019年4月20日，<https://sichuan.scol.com.cn/fffy/201904/56856621.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10. 《中国（四川）日本产业合作圆桌论坛》，2019年8月23日，成都日报，<http://www.cdrb.com.cn/epaper/cdrbpc/201908/23/c47175.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11. 《成都高新区如何发力超高清视频产业？这场大会谈干货》，2019年12月2日，新华网，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9-12/02/c_1125299423.htm，访问时间：2020年10月28日。
12. 《中国（四川）日本产业合作项目研讨会举行 推动四大项目加快建设》，2019年12月22日，四川新闻，<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91222/001018686.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13. 《成都市武侯区城市设计产业中心全球招商推介会成功举办》，2020年5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cdwh.gov.cn/wuhou/c135983/2020-05/12/content_bd65982c98f6492e81af9e3f9f77567f.s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中日韩经济合作

14.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挂牌成立 落地成都高新区》，2020 年 5 月 21 日，新华网，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20-05/21/c_1126016093.htm，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15. 《“共享新机遇”系列活动-2020 成都对日开放合作推介活动》，2020 年 7 月 16 日，成都市投资促进局官方网站，http://cdtc.chengdu.gov.cn/CDSTZCJWYH/c138915/2020-07/16/content_58e063adab444fb99aed92d31ddb89c1.s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16. 《成都服务业再签 877 亿元项目大单 交子公园商圈表现抢眼》，2020 年 8 月 28 日，四川在线，<https://sichuan.scol.com.cn/ggxw/202008/57887297.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17. 《2020 首“出”国门！成都—东京“云”上开启创新对话》，2020 年 9 月 25 日，成都科技，<https://dy.163.com/article/FND6LB770511ABJ0.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18. 《中日生态环保合作暨环保产业投资推介会在成都召开》，2020 年 10 月 13 日，新华网，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20-10/13/c_1126600246.htm，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19. 《2020 中日韩（成都）中小企业经贸创新峰会昨日举行》，2020 年 10 月 21 日，人民网，<http://sc.people.com.cn/n2/2020/1021/c345167-34364244.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20. 《知名日资企业组团入川！聚焦“双城经济圈”战略机遇》，2020 年 10 月 29 日，人民网-四川频道 <http://sc.people.com.cn/n2/2020/1029/c345167-34382221.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
21. 《双流·中日韩产业园 | 解码“六园”：国际合作新城，形塑未来双流副中心~》，2020 年 10 月 26 日，双流中日韩示范产业园（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njmxVs6cE7J9jPS7Fa8fjA>，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22. 《“云”上促合作！重庆向在渝日韩企业抛“橄榄枝”》，2020 年 4 月 15 日，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1988438334_7685293e019001kw9.html?from=news&subch=onews，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23. 《2018 年 3 月 15 日（周四）成都 JETRO 举办“中日（重庆市）老龄产业交流会”诚邀各企业报名参会》，2019 年 3 月 15 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方网站，https://www.jetro.go.jp/china/topics/_420303.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24. 《重庆首个中日国际诊疗中心成立》，2018 年 7 月 14 日，腾讯·大渝网 <https://cq.qq.com/a/20180714/015904.htm>，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25. 《重庆—日本经贸交流恳谈会在东京举行》，2019 年 5 月 30 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30/c_1124561276.htm，访问日期：2020 年 10 月 28 日。

中日韩经济合作

26. 《中日（重庆）养老产业国际合作交流会成功举行》，2019年5月14日，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13890583_100271050，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27. 《中日（重庆两江）大地生物医药产业园落户两江新区》，2019年5月30日，两江新闻，http://www.liangjiang.gov.cn/content/2019-05/30/content_533202.htm，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28.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两江新区赴日参加中日产业合作论坛并开展招商引资》，2019年7月10日，两江新区官网，http://www.liangjiang.gov.cn/Content/2019-07/10/content_544952.htm，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29. 《“云”上促合作！重庆向在渝日韩企业抛“橄榄枝”》，2020年4月15日，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1988438334_7685293e019001kw9.html?from=news&subch=onews，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30. 《2019年中日改善大气环境示范研究项目中期评估会在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19年10月30日，腾讯网，<https://new.qq.com/omn/20191030/20191030A0N6XP00.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31. 《中日（重庆两江）大地生物医药产业园落户两江新区》，2019年5月30日，两江新闻，http://www.liangjiang.gov.cn/Content/2019-05/30/content_533202.htm，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32. 《重庆首个中日国际诊疗中心成立》，2018年7月14日，腾讯·大渝网，<https://cq.qq.com/a/20180714/015904.htm>，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8日。

第三章 基于 Shapley 值的中日韩跨境电商供应链协同利益分配博弈策略研究

郭星辰³⁴

【摘要】 本文首先对我国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的利益分配现状进行分析，在借鉴现有利益分配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由单个日韩化妆品供应商、单个物流公司与单个中国进口电商平台组成的三级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运用 Shapley 值法建立了供应链利益分配基础模型，考虑了不同成员间利益生成的重要性和风险、效率等其他参数来避免均衡分配。通过综合考虑风险承担、额外补贴和实施程度等因素来修正 Shapley 值法的不足，建立了供应链利益分配的改进模型。最后采用数值分析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改进后的利益分配方案使中国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上各主体的收益都比原先有所增加，同时也激励了中日韩三级跨境电商供应链总收益的增加，有助于缓解各参与者与整个链条之间的利润目标冲突，从而实现整个系统的利润最大化，实现三国贸易共赢的局面。

【关键字】 中日韩跨境电商、收益分配、供应链协同

一、背景

跨境电商随着新零售的兴起而得到蓬勃发展。中日韩经济贸易合作有利于推动东亚区域跨境电商物流业的发展。不同于传统贸易方式，跨境电子商务对跨境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业务产生了重大变革。

作为全球排名二、三位的电子商务交易中心，且由于中日韩独特的地理优势，时差仅 1 个小时，物流运输时间较短。中日两国拥有最成熟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中国已成为日本跨境电子商务的最大输出国。日本是全球三大经济体之一，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位，基础环境良好。中国占据韩国 68.72% 的跨境电子商务主要出口份额，是韩国化妆品的主要出口国，中国占据韩国 68.72% 的跨境电子商务主要出口份额，且中国是韩国化妆品的主要出口国，占韩国向全球出口化妆品比例的 91.23%。

跨境电商作为中日韩贸易的新形式，呈现出交易规模递增、交易模式集中、支付方式多样以及商品结构优化等诸多发展特性。中日韩跨境电子商务兴起繁荣，但跨境供应链在运作过程中常常会因链上不同国别节点的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独立决策，导致整个跨境供应链难以协调，因此建立激励相容的利益分配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分配策略成为确保跨境电商供应链持续稳定发展的核心。本文通过对基于日韩贸易的中国进口跨境电商供

³⁴ 郭星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guoxingchen16@163.com

中日韩经济合作

应链进行利益分配研究，在传统 Shapley 值法的基础上，建立了改进 Shapley 值法来确定收益分配系数，进而实现中国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上各主体利益的合理分配，使其能够促进中国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的平衡发展。

二、模型构建

现在以日韩化妆品供应商 A、物流公司 B 与中国进口电商平台 C 组成的三级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为例。

针对中国进口跨境电商平台从日韩两国进口美妆护理用品的供应链设计利益分配模型。由于中国与日韩化妆品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它包含了中国进口跨境电商平台，日韩化妆品供应商、境外物流商、境内物流商、海关、仓库及最终用户，还有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业，所以研究中国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故为了研究进行的可行性，构建了由单个日韩化妆品供应商、单个物流公司与单个中国进口电商平台组成的三级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设计了基于 Shapley 值的利益分配方案。

当 n 个人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对于他们之中若干人组合的每一种合作形式，都会得到一定的效益，当人们之间的利益活动非对抗性时，合作中人数的增加不会引起效益的减少。这样，全体 n 个人的合作将带来最大效益，Shapley 值法是分配这个最大效益的一种方案，其定义如下：

设集合 $N: \{1, 2, \dots, n\}$ 如果对于 N 的任何一个子集 s （表示 n 个成员集合中的任一个联盟）都和一个实值函数 $V(s)$ 对应且满足条件：

$$v(\phi) = 0$$

$$v(S_1 \cup S_2) \geq v(S_1) + v(S_2), S_1 \cap S_2 = \phi$$

$[N, V]$ 称为 n 个成员国的合作对策， V 是对策的特征函数， $V(S)$ 则是合作 S 的收益。 X ，表示集合 N 中 i 成员从最大的合作收益 $V(I)$ 中分配到的收益额， $X = (X_1, X_2, X_3, \dots, X_n)$ 表示 n 个成员合作对策分配额的集合用，得出成功合作满足的条件为：

$$W(|s|) = \frac{(n-|s|)!(|s|-1)}{n!}$$

$$\sum_{i=1}^n X_i = v(I), \text{ 且 } X_i \geq v(i), i=1, 2, \dots, n$$

当记 $\phi(v) = (\phi_1(v), \phi_2(v), \dots, \phi_n(v))$ 为合作定量时候， $\phi(v)$ 则表示在合作成员第 i 个成

员的收益分配（Shapley 值）其公式表达为：

$$\phi_i(v) = \sum_{S \in S_i} W(|s|) [v(s) - v(\frac{S}{i})], \text{ 其中, } i=1, 2, 3, \dots, n$$

其中, S_i 表示集合中包含成员的所有子集; $|s|$ 表示联盟中成员个数; n 表示集合中的元素个数; $W(|s|)$ 表示加权因子; $V(s)$ 表示子集 S 的收益; $v(\frac{S}{i})$ 表示子集中除去成员后取得的收益。

三、模型改进

Shapley 值法在合作收益的实践中应用广泛。它并非平均分配收益,而是基于联盟成员在联盟中的贡献程度来分配。Shapley 值法实际上是联盟成员边际收益的加权和。但是,经典的 Shapley 值法存在诸多的不足,它将风险承担、资金投入等每个节点的影响因素均看成 $1/n$, 忽略了利润分配中的其他因素。对于联盟成员风险承担不等的情况,需根据风险承担大小对 Shapley 值法的利益分配方案做适当的修正。

改进 Shapley 值的方法步骤:

在 Shapley 值的基础上,设合作对象的集合为 $I = \{1, 2, \dots, n\}$, 修正因素的集合为 $J = \{1, 2, \dots, m\}$, 第 i 个合作对象对应的第 j 个修正因素的测试值为 $a_{ij}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修正矩阵用 $A = (a_{ij})_{n \times m}$ 表示。为消除各因素间属性和量纲带来的不可公度性,对矩阵 $A = (a_{ij})_{n \times m}$ 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处理方法为:

$$b_{ij} = \frac{a_{ij} - \min a_{ij}}{\max a_j - \min a_j}$$

可得到规范化的利益分配修正矩阵 $B = (b_{ij})_{n \times m}$, 即:

$$B = \begin{bmatrix} b_{11} & b_{12} & \dots & b_{1m} \\ b_{21} & b_{22} & \dots & b_{2m}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b_{n1} & b_{n2} & \dots & b_{nm} \end{bmatrix}$$

在中国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中,各企业实际承担的风险不同,而承担风险的大小与利益分配成正比。企业承担的风险分为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外部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环境风险

等；内部风险包括制度风险、运作风险等。

由于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于跨境物流系统的高效运作，这会直接影响到终端消费者的交易实现和客户体验。且由于跨境物流过程需要跨越国境，距离远、流程复杂、耗时长。与国内物流不同，跨境物流流程中增加了商检、报关、退税和国际结算等环节，大大延长了商品送达的时间，使得跨境物流公司承担的风险更多，投入的资源也更多。另外，物流企业正在向专业化、信息化发展，利用大数据技术，结合供应链思想，努力实现物流信息共享，这就需要更高的创新水平。

四、结论

根据上述收益分配模型中，中日韩跨境电商三方应遵循如下原则：

（1）共赢原则。企业之所以选择合作是因为合作可以带来比单独经营更多的收益，如果无法让参与合作的成员获得更多的收益，那么合作关系便难以持续。所以要满足供应链合作时的个体收益大于加入合作之前的收益，并且供应链整体利益也要大于非合作状态下的收益。

（2）公平分配原则。改进的利益分配方案必须让供应链企业获得与之贡献与地位相对等的合理收益。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能让供应链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有利于合作关系的持续与供应链整体收益的提高。

（3）风险与收益对称原则。企业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收益通常是正相关的。在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中，企业承担的风险的程度有所不同。对于承担较高风险的企业，应在利益分配时给予倾斜，这样不仅能增强合作的积极性，还能使供应链成员共同承担风险。

（4）信息公开原则。在合作关系中，信息的沟通是极为重要的。在设计利益分配方案时，也应坚持信息公开的原则，将方案制定的过程、策略告知合作企业，倾听各主体的建议，从而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

（5）充分参与原则。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的利益分配与各合作挂钩，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不能只由某一两个主导企业来做决定，应积极听取各个合作成员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求，共同协商，使每个企业都充分参与分配方案的制定过程。

五、发展建议

对上述中日韩三级供应链模型可以有如下建议：

（1）日韩供应商。日韩供应商应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竞争力的提升是日韩供应商在进口

跨境电商供应链中提高利益分配的根本举措。企业首先可以从产品本身努力，如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加强库存管理，按照下游企业库存策略、订货策略以及配送策略进行计划和管理；加强品牌宣传，提升产品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也可以创新产品的销售渠道，利用新技术和新渠道改变单一的传统销售方式，开展多渠道营销模式，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为宽广的未来。除了充分提升自身在各方面的发展外，日韩供应商应该利用行业力量，建立行业协会增强与进口跨境电商平台的谈判能力。同时行业协会也可以对进口跨境电商平台进行一定的监督，避免进口跨境电商平台滥用其优势地位，维护日韩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2）物流服务商。物流公司加入供应链联盟的目的是增加利益，在过去的经营中，物流公司对资源开发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其即使拥有核心的运输资源，在中国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中的地位并不高，获得的收益也较低。物流公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在供应链中的利益分配。如海外仓的建立和管理，海外仓的建立就意味对其仓储管理需要更加规范化和智能化，使商品的销售利润有所提高，不仅减短了发货时间也使跨境物流交易更加简便；采用物流供应链管理方式，加强物流监控和预测，以保证货物的准时运输和配送；加强物流人才培养，因为只有专业的物流人才才能够使物流企业的管理更加智能化；要不断推进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市场创新以及网络创新，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改造生产作业系统，积极开发更为先进有效的信息系统，才能提高效率，从而在中国进口跨境电商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3）中国进口跨境电商平台。中国进口电商平台拥有销售货物的功能。由于中国进口电商平台与市场联系紧密，从而能够掌握大多数的客户资源。通过这些市场资源，他们能很好的评估物流运输服务的市场价值，从而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首先，构建精准化匹配和导购推荐系统。通过所积累的大数据和信息优势定位买卖双方的精确诉求，在进行多元化比较的基础上，以价格梯度化的方式实现导购和客户筛选；其次是加强对跨境电商供应链的整体管控。跨境电商平台对跨境交易流程的各环节、各要素进行系统梳理，并将平台企业内部及节点企业之间的各种业务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实现供应链中所有活动的无缝对接；同时，也应加强与日韩供应商、物流服务商的合作，通过合资、控股等方式深入合作，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

六、参考文献

1. 李虹. 基于案例的跨境电商供应链类型比较分析[J]. 企业科技与发展, 2019(09):223-225.
2. 张秋霞, 何留杰, 张来顺. 基于联盟博弈的云任务调度及 Shapley 值法的收益分配模型[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20, 37(05):275-280+320.
3. 成福伟. 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中日韩物流合作分析[J]. 价格月刊, 2015(08):50-53.
4. 刘晓亚. 中韩自贸协定与两国跨境电商的前景[J]. 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 2018(02):4.
5. 闫云凤. 中日韩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测度与比较[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1), 74-80.

第四章 继续推进中日韩经贸合作中的障碍与应对措施

李南希³⁵

【摘要】中日韩三国的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与互补性利益。目前中日韩经贸合作发展状态良好，中日韩 FTA 的谈判也推进到新阶段。但随着近年来中美之间摩擦逐渐升级、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等，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显示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日韩合作关系间的问题点也暴露出来。因此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三国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推进中日韩经贸合作必要之路，也是维持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途径。

【关键字】中日韩 经济合作 东北亚 区域一体化

一、引言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历史悠久。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韩三国都是区域合作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伴随着经济区域化的趋势，中日韩的经济贸易紧密度、依存度相较以往大大提升。中日韩三国坚持推行的自贸区战略，也将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也推进到新阶段。然而近年来，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之风盛行的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显示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日韩三国都对贸易自由、多边贸易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诉求，是维护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克服摆在中日韩合作面前的障碍，寻求良性解决路径，继续开展和推进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与交流尤为重要，这也是维持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途径。

二、中日韩经贸合作发展状态良好

中日韩间的贸易合作在双边和三边都取得了可见的成果，贸易联系也在逐步增强。中日贸易规模扩大，稳步进行。近年来，中日双边贸易活动开展幅度增加、规模扩大，如今中国位居日本贸易伙伴国第一位，日本位居中国贸易伙伴国第二位。³⁶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 年中日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3039.1 亿美元，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 21.3%³⁷。即便是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巨大冲击下，截止到 2020 年 5 月，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1166.6 亿美元，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 13.6%。³⁸ 中国和日本作为区域内重要的合作伙伴，

³⁵ 李南希，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研究生在读

³⁶ 根据商务部数据计算整理

³⁷ 数据来源：国别数据 2019 年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110209.asp?id=11950>

³⁸ 2020 年 5 月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 <http://www.sinoimex.net/ReportDetail.aspx?cod>

中日韩经济合作

在贸易合作上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中日贸易结构具有互补性。从贸易种类上来看，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产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主要包括机械器具、纺织原料、杂项制品等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及原料、鞋靴伞和箱包等轻工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中占据半壁江山。日本对于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运输设备等产品，其中化工产品占总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额的比率逐渐增加。二是中日经贸合作的幅度和规模逐步扩大。在经历“钓鱼岛”事件和日本内部经济政策调整的冲击之后，中日进出口金额自 2014 年之后呈稳步上升趋势。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也由 2015 年的 2698.6 亿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3039.1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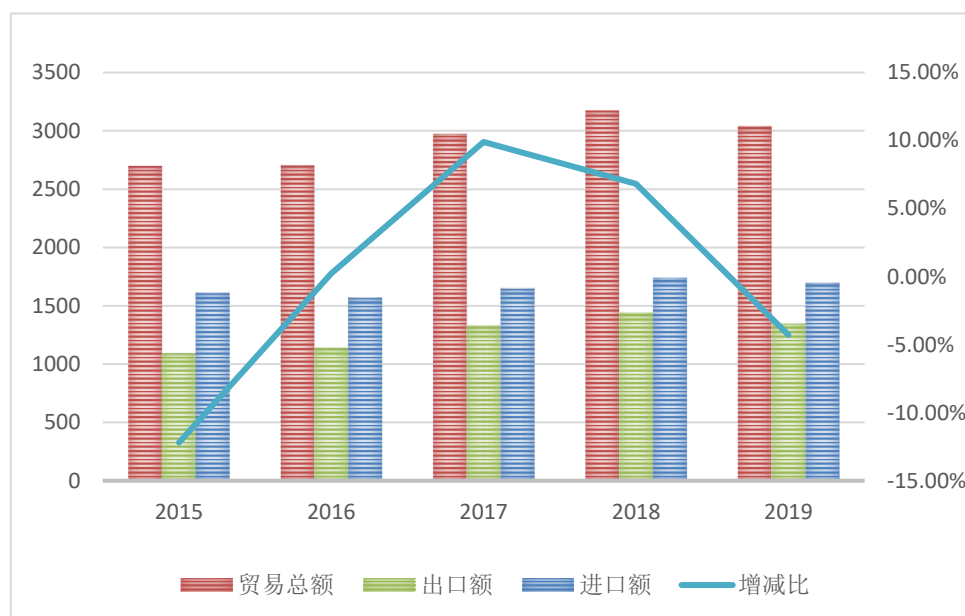


图 4-1 中日进出口贸易额变化³⁹

中韩两国自 2015 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受到萨德部署等问题的干扰，中韩贸易总额不增反降。然而在文在寅政府上台之后，积极缓和中韩关系，中韩经贸自 2017 年后也逐步恢复正轨，以 2018 年中韩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0 周年为契机，双边贸易呈现增长状态。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 年中韩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2686.4 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 23.6%⁴⁰。2019 年中韩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2434.3 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 23.3%⁴¹。中韩两国的进出口产品也形成了主要集中于中间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其中韩国出口

e=384B3285315B0C5A

³⁹ 根据商务部数据计算整理。出口额为中国对日进口额、进口额为日本对华进口额。

⁴⁰ 数据来源：国别数据 2018 年韩国货物贸易及中韩双边贸易概况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09

⁴¹ 数据来源：国别数据 2019 年韩国货物贸易及中韩双边贸易概况国别数据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8418；中国投资指南网-引进来 <http://www.fdi.gov.cn/come-datatongji-con.html?id=142>

中日韩经济合作

中国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光学医疗设备等，2019 年起塑料橡胶产品占比上升成为韩国对出口中国的第三大产品。韩国自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等，其中在纺织品及原料、家具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优势仍然明显。同时韩国对华投资呈现增加趋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等。据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韩国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数累计共 9593 家，平均每年约新设 1919 家。韩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也由 2015 年的 40.3 亿增至 2019 年的 55.4 亿美元。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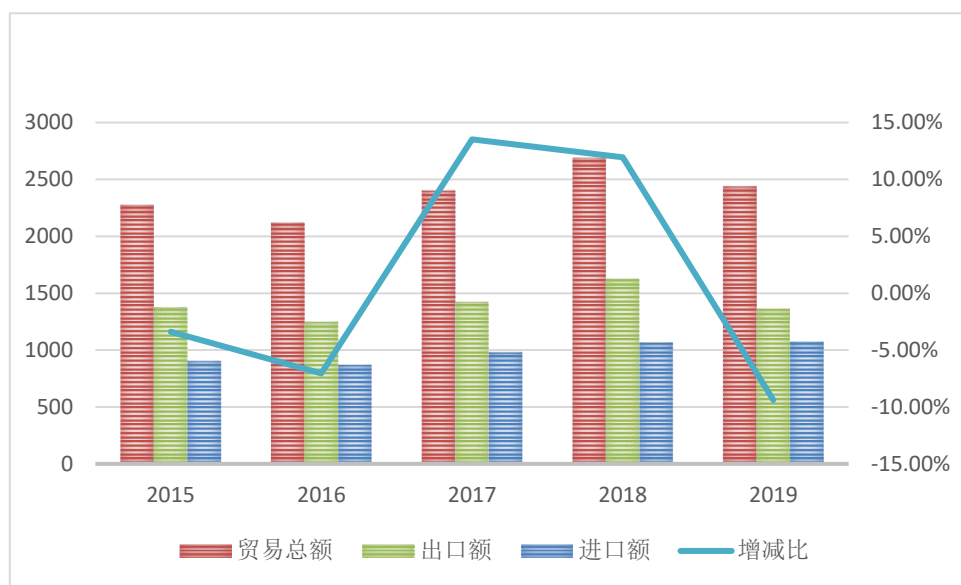


图 4-2 中韩进出口贸易额变化⁴³

中日韩多边贸易稳步推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合作关系。中日韩三国都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为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三国积极实现高层次对话谈判。2018 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一致达成构建“中日韩+X”合作机制，深化人文交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2019 年 11 月在韩国首尔举行自 2013 起中日韩 FTA 谈判的第十六轮谈判，对有效促进区域内经贸合作方案，推动谈判全面提速达成共识。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中日韩三国举行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就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务实合作达成重要共识。疫情期间由于三国政府采取各种积极的应对措施。前不久 11 月 15 日签署的 RCEP 协定也进步加速了中日韩 FTA 协定的签订，将进一步加深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和幅度，为中日韩三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助力。

⁴² 数据来源：国别数据 2019 年韩国货物贸易及中韩双边贸易概况国别数据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8418 ⁴³ 中国投资指南网-引进来 <http://www.fdi.gov.cn/come-datatongji-con.html?id=142>

⁴³ 根据商务部数据计算整理。出口额为中国对韩进口额、进口额为韩国对华进口额。

三、中日韩经贸合作中的障碍

中日韩的多边经贸合作已经显有成效，中日韩 FTA 谈判也历经多轮。但实际上签订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仍需时日，摆在中日韩三国面前的障碍仍然存在。这需要三国继续花费精力，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外交方面继续推进，才能早日实现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地区多边经贸合作。因此，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摆在中日韩深化合作中的障碍，才能采取进一步的改善措施。

（一）政治互信度低

日本、韩国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伙伴关系，但从深层及角度来讲，中日韩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并不是很高。特别是中日之间，日本对于中国仍然保持着防备心理。从地缘政治层面考虑，日本始终无法忽视中国在东亚地区内的影响力，认为中国是最具有威胁性的国家。伴随着近年来亚洲格局的全新转变，中国的影响力和自身实力逐渐提升，日本来自内部经济困境以及外部国家威胁的不安感剧增。安倍上台之后，立即稳步推进“安倍经济学”。对内推动政治改革经济复苏，对外开展战略性外交。一方面加大政府投资刺激国内经济，实行国内结构性改革，恢复日本国内活力。另一方面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等构想，从军事、外交、对外经济上打造全方位、多角度对外网络，在延续强化美日同盟的基础上，特别加强对东盟国家以印太为重点的地缘政治外交，以实现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企图。如此，日本重视发展与韩澳印东盟等的军事合作，目前已与澳法英韩印等国建立“2+2”会谈机制；与澳英加法等国军队分别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与印度军队签署协定的相关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日本加速拓展经贸合作也正在进行时，修订日本-东盟经济伙伴关系（EPA）加强服装贸易领域的交互；与英国达成自贸协定。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欲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构建印太地区的战略框架。日本也试图借美国在印太地区显示势力的东风，加深日美同盟，笼络印太地区国家，实现日本的“大国化”企图，以缓解来自中国的“威胁”压力。安倍上台之后，面对来自中美两方的双重压力，他选择了一种近似于“曲线救国”的对华政策。也有日本政治学者提出，安倍欲在亚洲搞“俾斯麦外交”。在选择稳固日美同盟、构建四国同盟的前提下，对华政策显现出矛盾感或者说是摇摆感。2012 年安倍二度执政之后参拜靖国神社，在野田内阁购岛事件上火上浇油，中日关系迅速恶化。2014 年中日之间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安倍允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并且逐渐恢复了首脑接触。中日关系明显改善，返回正常轨道。而 2020 年随着中美关系恶化，新冠疫情的影响，虽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中日两国的合作受到了双方政

府的肯定，但实际上日本紧跟美国步伐再次高呼“中国威胁论”，对华政策瞬间大转变。⁴⁴而安倍辞职后菅义伟的上台，依旧无法扭转目前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会继续延续安倍的外交政策和理念。总的来说，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延续了以往的“接触”与“防范”并重的战略框架⁴⁵，这也造成了中日之间无法增强政治互信的障碍。在中美关系摩擦的过程中，日本无条件倒向美国选择日美同盟，加速推进美日印澳同盟，再度加深了中日间的合作的隔阂。

中韩间的政治矛盾相较于中日相对较弱。主要是 2017 年自萨德部署之后，中韩关系曾一度紧张恶化，但经过两国之间的协调和对话，自 2018 年后逐渐恢复正常。但实际上中韩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再包括萨德遗留问题、渔业争端、岛礁争端仍然存在等等，这些都是阻碍中韩进一步合作的重要障碍。另外虽然文在寅上台之后对改善中韩关系作出明显的成效，但韩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仍然存在，其对华态度也很明确。这些都成为继续深入开展中韩合作的负面影响。

（二）经济障碍

首先是新冠疫情的冲击，给中日韩经济带来巨大创伤。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导致全球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造成了冲击，开展经贸活动受到巨大限制。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贸易额将较 2019 年水平下滑 7%—9%。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4.2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3.2%。⁴⁶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日本 2020 年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大降 19.2%。⁴⁷虽然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政府都在第一时间采取有力措施良好的控制了疫情，三国的联合抗疫也大有成效，但中日韩经济都难逃疫情之害。据统计，1~8 月中韩进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 3.7%；1~8 月中日进出口贸易同比仅增长 1%。⁴⁸三国间开展的经贸合作严重收缩，合作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特别是产业链的中断以及人员来往的限制，合作结构与形式可能会重新改版。此外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影响下，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闭关锁国”的做法，更多地考虑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国内产业链的自给自足。今年 4 月安倍就下令将大幅

⁴⁴ 杨伯江, 张伯玉, 徐万胜, 徐梅, 贺平, 吕耀东, 吴怀中, 刘江永, 卢昊.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J/OL]. 日本学刊:1-30[2020-10-3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7.d.20201021.0905.002.html>.

⁴⁵ 吴怀中. 日本对华大战略简析——以“接触”与“防范”为核心概念[J]. 日本学刊, 2012(05):65-80+158.

⁴⁶ 国务院新闻办就 2020 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_新闻发布_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0-07/14/content_5526721.htm

⁴⁷ 日本本财年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大降 - 财富中国网 <http://www.fubaore.com/guoji/20201020/100125935.html>

⁴⁸ 倪月菊. 疫情后的中日韩 FTA 谈判新机遇[J/OL].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7[2020-11-03]. <https://doi.org/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8.002>.

中日韩经济合作

度从中国撤资，将在华生产线转移至国内或其他地区，调整在华生产线。

另外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仅仅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也波及到日韩两国。中美贸易争端整个东亚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都产生了冲击，日韩两国必然难以独善其身。中国作为韩国第一大进出口贸易伙伴，在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后，明显对韩国进出口额下降。除此之外 2018 年开始美国对日本加征关税，日本对美国出口额也同比下降。另外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因产品大多出口美国也受到冲击。实际上中美贸易战的开启，不仅仅是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冲击，甚至造成了世界贸易的混乱。在这场贸易战中，中日韩三边的贸易关系受到了伤害，也会承受了很大损失。

再次日韩经济上的危机意识是继续拓展中日韩经贸合作的阻碍。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中韩两国经济互补性的重合度越来越高。韩国与中国的合作由原先的互补性良性合作，转变为现在带有竞争性质的合作。实际上韩国并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持续高涨，文在寅还是希望能够利用三方的牵制，使韩国在东亚的经济开展上占据主动位置，在东北亚地区提高韩国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基于此所提出的“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就是推行韩国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依据，强化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东盟的合作。另外日本也存在和韩国一样的思路，害怕中国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之后，日本将会作为以中国为主的经济圈的附属。当前中国成为日本进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再加上日本国内本身经济就处于疲软状态，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大幅提高。日本担心在依赖度提高的同时，中国日后将会把中国市场作为对日本经济制裁的一大利器。这也是日本在努力构建印太同盟时经济方面的考量。

日韩之间的贸易争端也是不可忽视的。2019 年 7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将加强三种半导体核心原料对韩国的出口管制。之后多次双方对话却无疾而终。接着日本又将韩国排除在“白色清单”之外。两国关系一度紧张，大规模抵制日货的活动也在韩国国内形成流行。实际上日本并不想轻易地取消对韩国的经济制裁，想利用对韩国的强硬态度来获取国民的支持度加快完成政治策略。因此直至今日双方也没有就此问题顺利解决，还处于观望状态。

（三）外部因素

在亚洲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就是美国的干预。美国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在亚洲也足以存在。这一因素可谓是进一步发展中日韩经贸合作的隐藏关卡。对于美国而言，他所希望的是霸权而不是均势，当然不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腾飞。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渐发展，世贸组织体制的漏洞显露，建立区域性的自贸机制成为

中日韩经济合作

最具有优势的战略选择。而中日韩三国一旦达成 FTA 协定，注定将会削弱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影响其控制亚洲政治的主导力。为此美国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图牵制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开展。日本也选择了加入，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从美抗华的政治选择。

实际上美国干预不仅仅是美国单方面的从国家利益出发遏制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日韩对于安全的恐惧，在与中国拓展市场提升经济水平和美国的安全保障之间选择了后者。自上个世纪起建立的韩美同盟、日美同盟直到今天还在延续。虽然在今天同盟关系能够看出有所松动，两国也都想寻求完全的自主权，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两国军事上对美的严重依赖，从整个国家的独立性来看，是受到很大制约的。多年来频繁挑起的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等都是美国“对华强硬”态度的展示。一旦中美两国真的在南海、台海上挑起战争，对于日韩来说可谓是致命的安全威胁。除此之外还未完全解决的朝核问题，特别是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不安因素。这样的军事需求在美国笼络日韩继续成为其东亚战略根据地的情况下，成为了双向选择。

（四）历史遗留问题

中日韩三国是邻国。二战期间，日本在发动的战争行为对日韩两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并没有从战争的惨痛教训中醒悟反省，无法正确认识历史，甚至肆意扭曲历史。尤其是日本政坛长期呈现右翼势力把控的局面，对于历史问题的解决毫无推动。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惯用伎俩，对中日韩三国的关系增添负面影响。2014 年中日间达成了共识，安倍在任后期并未参拜靖国神社。但宣布辞职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又立即被爆出。不仅如此接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也在任期开始不久，就向靖国神社进献祭品。另外日本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都严重伤害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还有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之争，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日韩间的竹岛问题，强征劳工问题也作为矛盾基础多次引发争端，日韩关系多次紧张恶化。这些问题都是摆在中日韩合作间悬而未决的历史矛盾。因此日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历史，主动承担因发动战争留下的历史责任，客观公正独立清晰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重建三国人民间的信任，才能在推进中日韩合作上增添动力。

四、进一步推进中日韩合作的措施

加强三国政府间的政治互信。多边政治关系会影响多边贸易的开展，良好的政治互信是开展经贸合作的政治基础。中日韩三国应增强政治互信，在美国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情况

中日韩经济合作

下明辨是非，客观公正地看待各方的发展，将对方的发展看作是自身发展的机遇。努力抓住机遇，创造发展平台，实现共同发展。2015 年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曾强调“增强东亚共同体意识”。中日韩三国要深刻认识到东北亚区域是一个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要增强东亚共同体意识，加强互为合作伙伴的战略意识。为此要加强三方高级别、高层次对话，搭建高层次、多角度、国际化的对话交流平台，进一步维持发展三边关系，共同维护区域内的和平稳定。特别是对于关系内存在的争端与争议，要直观面对理性对待，应该采取富有灵活性的解决措施，在严控矛盾升级的前提下推动解决。

加快产业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合作战略协调，拓展新领域的合作。中日韩三国在产业结构上有相当可观的互补性。中国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在日韩市场上优势明显；日本在智能创造技术开发等领域有比较优势；韩国在工业技术研发等方面领先。并且日韩相较于中国发展较早，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上游，而中国起步较晚，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较下游位置，三方之间的互补性可见一般。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低劳动成本和劳动力丰富的优势逐渐降低；日本由于产业海外转移也引发国内经济低迷；韩国也因国内市场狭小而颇受局限。这都要求中日韩三国要重新研判国内外经济情况，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改革。充分发挥三国各自的相对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外，活用各国经济政策，推动经济政策对接。例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和韩国提出的“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虽然两个政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对接也是具有条件性的，但是不影响其在两国经济合作某些领域方面的指导作用。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台海问题、朝鲜核问题等等都是在中日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不仅是日韩在某些程度上大幅依赖美国的重要原因，也有可能引起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摩擦。反而言之，如果能够保障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那么在弱化韩美同盟、日美同盟，推动中日韩关系发展上将会具有推动作用。对于安全问题最有可能采取的极端方式就是展开军备竞赛。但历史证明，军备竞赛是不可取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安全威胁，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战争和地区性冲突。因此中日韩三方应在安全方面达成共识减少分歧，严格控制矛盾冲突，防止双边关系倒退。在台海问题上，日韩应该尊重历史，客观公正的进行判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于朝鲜无核化问题，应该主动引导各方对话，例如采取重启六方会谈，或将其程序化和固定化等积极措施，加快朝鲜无核化进程。三方应共同努力主动承担责任，进一步完善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提升国防对话级别，加强互信和沟通，共同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扩大人文领域的交流,强化合作的民意基础。新冠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的联合抗疫,受到了国际上的瞩目,为全球抗疫树立了典范。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日韩三国的民间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各自民众的负面认知和情绪。在继续这种局面的同时,扩大人文交流规模,丰富人文交流内容,创新人文交流形式。进一步扩大政府间的宣传,倡导舆论方向向好发展。进一步推动中日韩三国学术界、文艺界等各界的对话交流,开展高层次、高频率、高水平的接触。发挥各国之间民间友好人士的作用,支持民间友好团体和民间友好人士的交流与合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促进国家间旅游业的发展,刺激经济的同时,身临其境感受对方国家的风土人情,加深民众对对方国家的深入认识。

历史遗留问题不能视而不见。中日韩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是进一步深化三国合作中隐隐刺痛的针。长久以来日本政坛主以右翼势力占上风,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但踌躇不前,甚至有所激化。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坚持尊重史实的原则,对于曾经侵犯国家主权的历史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并严肃有力应对。特别是日本方面,要正视历史,承认历史,反思历史。杜绝出现类似于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歪曲历史的行为。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历史遗留问题并不是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全部,也并不是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应让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影响三国深化合作关系的绊脚石。应从大局出发,防止因历史遗留问题引发国家间的摩擦与冲突。加强各个领域间的合作交流,用良好的合作关系推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以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促进合作交流的幅度和深度。

五、参考文献

1. 门洪华. 化竞争为协调的新时代中日关系[J/OL]. 日本学刊:1-25[2020-11-0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7.D.20201019.0902.006.html>.
2. 倪月菊. 疫情后的中日韩 FTA 谈判新机遇[J/OL].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7[2020-11-03]. <https://doi.org/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8.002>.
3. 郭一伦, 宋玉超. 透视日本“印太构想”军事篇[N]. 解放军报, 2020-04-30(011).
4. 宋玥. 中日韩区域合作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应对研究[D]. 吉林大学, 2020.
5. 赵金兰. 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D].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16.
6. 吴怀中. 日本对华大战略简析——以“接触”与“防范”为核心概念[J]. 日本学刊, 2012(05):65-80+158.
7. 杨伯江, 张伯玉, 徐万胜, 徐梅, 贺平, 吕耀东, 吴怀中, 刘江永, 卢昊.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J/OL]. 日

本学刊:1-30[2020-10-30].

8. 国别数据 2019 年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110209.asp?id=11950>
9. 2020 年 5 月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 <http://www.sinoimex.net/ReportDetail.aspx?code=384B3285315B0C5A>
10. 国别数据 2018 年韩国货物贸易及中韩双边贸易概况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309
11. 国别数据 2019 年韩国货物贸易及中韩双边贸易概况国别数据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8418
12. 中国投资指南网-引进来 <http://www.fdi.gov.cn/come-datatongji-con.html?id=142>
13. 国务院新闻办就 2020 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_新闻发布_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0-07/14/content_5526721.htm
14. 日本本财年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大降 - 财富中国网 <http://www.fubaore.com/guoji/20201020/100125935.html>

第五章 全球治理视域下中日韩合作的未来走向

李美姗⁴⁹

【摘要】全球治理要求在平等协商原则和国家参与的基础上，重视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社会力量，广泛关注各类危机，重点关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与国际伙伴积极探讨解决方案。作为邻国，中日韩三国的关系随着经贸等合作加深不断升温，在未来进行多方位全面合作是必然趋势。然而在当前国际背景下，中日韩合作存在如下挑战：单边主义扰乱区域合作秩序、历史争端影响民心相通、刻板印象妨碍文化交流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破坏区域安全状态等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案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先着眼于局部，搞好亚洲区域合作。在未来，中日韩三国应当加强经济一体化趋势，构建政治互信基础，加强文化交流氛围，启动东亚治理新秩序。

【关键词】 全球治理；中日韩合作；区域合作；国际秩序；新机制

一、全球治理的定义和内涵

全球治理这一理论概念最早在 1992 年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提出，他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非国家中心的治理状态，并且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 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不是同义语，它们之间有重大区别。他摒弃了统治的治理的概念，而是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虽未得到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管理机制，并且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除了詹姆斯·罗西瑙以外，罗茨和威格里·斯托克等西方学者也为全球治理给出了相关的理论定义。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俞可平，2002）。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指出，所谓全球治理，就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导向，通过多元行为主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形成一定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共同应对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敖云波，2011）。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俞可平，2002）。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全球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或包括

⁴⁹ 李美姗，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研究。

中日韩经济合作

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俞可平，2002）。学界普遍认为，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以下五个：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或客体，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

总的来说，全球治理是指打破国界限制和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治理模式，号召对一些普遍的全球性问题如毒品和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共同治理，以维持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正常和稳定。全球治理要求在平等协商原则和国家参与的基础上，重视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社会力量，广泛关注各类危机，重点关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与国际伙伴积极探讨解决方案。

二、中日韩合作的历史发展

中日韩三国自古就是友好邦交，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同根同源的文化使得三国的交往和联系一直都十分紧密和频繁。建国以来，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之上，与日韩两个邻国建立起了友好外交关系。

中日韩三国的关系随着 1997 年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举行而不断升温，2002 年 11 月起更是提出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开启了多轮谈判。随着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中日韩多方位全面合作亦是必然，三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目前，三国已经建立了以领导人会议为中心、21 个部长级会议为主体、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等为支撑的全方位合作体系。务实合作涵盖经贸、交通、信息、海关、环境、科技、农林等近 30 个领域。在 2018 年，三国间贸易总额达到 7200 亿美元，相互间投资额接近 120 亿美元；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人员往来超过 3000 万人次，相互理解和认知也在不断加深（李克强，2019）。2019 年 12 月 24 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共同确立了全新的未来三国合作框架。2020 年 5 月，中国表态应当加快中日韩自贸谈判，力争年内能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一步深化经济融合，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进一步促进中日韩合作。在 2020 年 11 月 15 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将进一步推动三国关系的新发展。

此外，在 2020 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合作方面，三国之间互帮互助、共同抗击疫情也可圈可点、十分瞩目。在疫情爆发初期，面对中国防疫物资紧缺这一情况，日韩两国都积极伸出援手，提供口罩等必要物资，帮助中国渡过难关。而后随着疫情在日韩两国蔓延和爆发，中国在有序复工复产的前提下，也提供了防疫物资帮助，且派出专家与外国分享中

国的抗疫经验。

因此，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源远流长，相关的合作机制也随着交流的扩大以及经贸关系密切而不断完善，并且目前在积极协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具体方案的过程中三国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在未来，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推动，中日韩合作将更上一层楼。

三、当前三国合作机制下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国际背景影响作用以及现有三国合作机制推动下，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中日韩合作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问题。

（一）国际单边主义盛行，扰乱区域合作秩序

美国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极力奉行单边主义、推崇贸易保护主义，频繁退出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一系列逆全球化行为层出不穷。作为大国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以上行为是对承担国际责任的逃避，加剧了大国之间以及热点地区的冲突，扰乱了全球化秩序，多边体系受到挑战（杨娜，2020）。美国以自身利益为主，目光只局限于本国经济，拒绝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当的国际责任，扰乱国际上行之已久的区域合作秩序，同时也为其他国家作了一个不良示范。

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盟国，相关行动亦受限于其意图影响。因此，美国霸权主义也为当前中日韩合作机制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中日韩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克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以多边主义的对话协商积极推进区域合作和经济全球化。

（二）历史遗留争端问题明显，影响三国民心互通

中日韩三国历史悠久，然而三国自古以来长期的接触和交往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历史上也有发生不少摩擦。在不同的利益驱动以及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引导之下，三国对历史事件认识不同而导致的一些摩擦甚至不断升级为历史争端，代代延续，影响三国关系健康良好发展。

具体来说，在中日韩三国面前的突出性历史问题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历史问题得到日本右翼势力方面的歪曲，在持续发酵，引发中韩民众不满，严重影响三国感情。朝鲜半岛上也并不十分太平，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而近来中韩两国对朝鲜战争的不少评议也出现偏差，无法达成共识，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影响两国各项事业有序推进。在未来三国仍应加强对话机制的建设，在历史问题上达成进一步共识，建立政治互信基础。

（三）刻板印象和偏见存在，限制民间文化交流

中日韩三国传统文化同根同源、相互渗透，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三国为亚洲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在抗击新冠病毒过程中，亚洲国家普遍团结一致的出色表现令人瞩目。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儒家文明圈”国家的抗疫成效明显好于欧美国家，很大程度上在于儒家文化服从权威、提倡克己、重视集体、崇尚奉献、尊重知识（于运全，2020）。然而，受部分影视文化作品和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等影响，中日韩三国对彼此仍然存在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尤其是在当下互联网时代，一些极个别不愉快事件在网络上被放大、相关问题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大大影响甚至阻碍民间文化交流。例如，近年来一些韩国明星对中国生活经历的夸大扭曲及其他不正当的言论，抹黑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引起了中国网民强烈的抵触和不满，伤害两国民众感情。

放眼世界，国际上不少国家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让我们不悦，其中一些偏见甚至上升到种族歧视层面，影响亚洲融入世界潮流。文化交流中最忌讳态度傲慢，缺乏开放包容和互相尊重的心态。同理，亚洲国家内部也应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并始终保持尊重。有效消除偏见的方式就是交流，力争以扩大交流对话的形式化解矛盾、误解和冲突。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状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必须打破偏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

（四）非传统安全问题肆虐，破坏区域安全状态

美国原本是大多数全球治理机制的主要创立者，然而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除了退出许多重要国际组织，还退出多个国际多边机制，如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导致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困境。在大型国际治理机制陷入僵局的背景之下，东亚区域治理机制的推出对中日韩三国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切合三国的利益，也更符合东亚地区的需求。

在安全方面，公共卫生危机、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毒品泛滥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自身安全，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非传统安全问题因其潜伏时间长、表现形式广泛等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一旦这些问题在某个地区爆发，必将波及周边或更为广泛的地区，其涉及领域之广泛也将对人类造成重大影响，显然单凭某一特定国家的力量无法有效解决此类重大问题。传染性疾病在很早就一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最早被人们认识到的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目前国际也在这方面

的合作也已经有了重大进展。曾于大范围流行的天花、鼠疫、霍乱和大流感等传染性疾病给许多国家带来了致命性打击，当时国际上普遍因为缺乏国家间的合作而付出了惨重代价。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甲型 H1N1 流感、埃博拉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因为各国的共同合作抗击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没有造成大规模损失。而新型冠状病毒在 2020 年的流行又为这种国际间共同合作的升级带来了警示和启发，人们必须对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重视起来，以构建和完善区域治理的机制带动展开全球治理新篇章。毕竟，全球治理离不开区域治理的经验和启示。

四、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下中日韩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要促进中日韩三国友好合作交往，打造区域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都不能绕开和回避以上问题。地球是人类共同家园，各国应当携手针对全球性问题一同进行治理。部分与整体的哲学原理要求我们必须着眼于局部，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搞好中日韩合作，打造东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亚洲新秩序。

因此，根据全球治理的概念定义和内涵，以及综合中日韩合作现状和困境，在全球治理视域下，中日韩合作需要在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明确参与治理的主体和治理客体，制定完整的合作体系或规则，并且保障共同治理的有效性。具体来说，需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继续加强联系，完善经济一体化等区域合作机制，共同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等以保证区域的普遍安全状态。

（一）三国合作紧密联系，经济一体化融合趋势更为明显

美国政府于 2018 年发动全球贸易战，无视现行国际贸易规则，打乱了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随着西方民粹主义频频抬头，近代以来世界权力在少数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并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把持国际秩序的历史正在发生改变，传统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制度性困境，转型与变革成为大势所趋（吴志成，2020）。在如今国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更需要我们破除阻碍开放的各种观念与体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动区域合作。

三国贸易高度依存，经济投资密切联系，中日韩合作现已存在一定基础，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目前正良好运行，中日韩三国在东盟“10+3”机制中也发挥出主导力量。在此过程中三国合作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为地区一体化的深化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日韩经济合作

此外，随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谈判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以及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王毅，2016）。在国际上各逆全球化势力暗流涌动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专家龙永图指出，区域一体化是应对逆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因此，三国要想共同应对逆全球化风险和挑战，应当联合起来，进一步紧密国家间联系，以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经济组织为依托，加强东亚区域一体化趋势，以经济一体化带动其他方面的一体化；并通过大欧亚伙伴关系等组织，以亚洲一体化带动欧亚一体化，最终共同融入全球发展大局。

（二）历史争端逐步减少，政治互信基础进一步巩固

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坚持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2015）。国家之间要想长期交下去并构建牢固的信任基础，尊重是基本前提。

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始终恪守互相尊重的基本准则：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他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尊重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方式；尊重他国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程，中国深谙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于是也积极追求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习近平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中日韩三国要想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也需要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的心态，尊重各国历史和事实，借助对话机制、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面对一些东亚地区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矛盾和争端，三国应当尽力避免冲突，尽量对历史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进一步达成一定的政治共识，服务于三国的区域共同发展。在尊重的前提下，对一些国际争议和历史争端，三国应当积极以对话协商的形式解决。在此过程中，还应当尊重现有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对本国的行为负责。要求国家在对话过程中以诚相待、开诚布公，尽量将问题解决在小处，不让相关问题持续发酵，酿成更大事故。除此之外，对于协商确定下来的共识和一系列成果，应当信守承诺，要“一诺千金”，积极践行自身许下的诺言。

（三）人员流动更为频繁，文化交流氛围大大加强

全球化时代，随着各国开放的扩大和交流的深入，多数国家在见证文化多样化过程中渐渐认识到要尊重文化差异，世界文明多样性。尽管中日韩三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临近的

中日韩经济合作

地理位置，同根同源的儒家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国与国之间仍然有着一定的文化差异。习近平同志强调，不同民族、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可以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只有秉持这样的文明观，不同文明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和谐进步（王毅，2016）。

迫于信息交流体系不完善和国家之间开放交流程度的不足，中日韩三国在历史交往中某些特定事件造成的偏见持续发酵，未得到根本解决，形成刻板印象，导致三国民众对彼此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随着全球化时代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不断升级，各国联系更为紧密，互动更为频繁，相信在未来能够得到很大改善，但前提是相关问题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并积极开展和扩大各项跨国交流事业。以中国为例，可以将非政府组织作为载体，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作用，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建立或扶持一批跨国性质的、促进民间交流的非政府组织，广泛欢迎日韩两国民众以文化传播、旅游和接受留学教育等事件积极来华交流，促进三国的人员流动。并且在此过程中，让中国故事在跨国交流中显示出活力和魅力，让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口口相传的故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进而吸引更多的日韩民众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并在来华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打破传统偏见的桎梏，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得以进一步提升。例如，中日韩三国的互联网意见领袖可以加大交流，在频繁的跨国交流过程中形成较为客观的看法，并将个人真实的所见所闻以互联网形式传播给更多的本国观众，进而改变相当一部分人的刻板印象。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效，从积贫积弱的欠发达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不少经验都值得与各国分享，讲好中国的“改革故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也至关重要。通过各种“故事”随着人员流动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能够有效改善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从而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能够得到重视，能够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其中，使其最终发挥出其应有的影响。

国际上种族歧视的问题长期存在，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最为明显突出，然而亚裔在国际上面临的处境也并不十分乐观。中日韩三国作为亚洲地区对外交流较为广泛的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对抗种族歧视等不公问题。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污名化”谩骂和抹黑的行为，日本和韩国作为邻国，是中国疫情防控更为清晰的见证者，应当在国际上肯定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积极为中国发声，共同反对“扣帽子”等不公现象。日韩两国应当意识到，东亚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其自身也息息相关，若对

一些国际上不公的“反华”现象姑息放纵，一系列“反华”行为早晚将会最终有意无意演变为“反亚”行为，影响本国及本地区人民走向世界。中日韩三国促进地区文化交流，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消除国家偏见和误解，共同打造和谐东亚、发出共同的“东亚声音”，将有助于我们在未来建设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四）构建东亚区域治理新秩序，打造东亚命运共同体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的模式有着共通之处，“强政府”及其背后强大的应对和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人民的尊重、理解和配合。中日韩三国在抗“疫”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快捷通道”等便利人员往来措施，相互伸出援手，为控制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相互帮助和支持下，中日韩三国的各项防疫物资和检测设备等都能得到有效供应，关于要不要戴口罩这一在西方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的争议在中日韩三国所处的东亚地区从没有发酵过，究其原因，除了文化作用，还因为中日韩三国都共同经历过“非典”时期，是患难与共、共克时艰的好朋友。这也说明了在东亚各国在历史上就有着不可割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密联系。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积极控制本国疫情的同时也大力对周边国家给予了相当数量的防疫援助，全力研制应对疫情的疫苗和特效药，致力于将其作为公共产品供应给周边国家及疫情较为严重的不发达地区，积极探索与周边邻国共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在未来，除了公共卫生治理领域，中日韩三国还应在更多领域中做到共同应对，极力解决各大影响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营造东亚地区普遍安全状态，打造休戚与共的东亚命运共同体。2015年11月，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中日韩三国联合应对新冠疫情，既是中国积极构建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理论的部分体现，也是三国为了实现共同安全的区域实践。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跳脱出国别的限制，以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目标，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主张以对话谋共识、以合作促安全；共同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是各国人民的选择，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钟声，2018）。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摆脱结盟

或对抗的窠臼，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王毅，2016）。

在未来，中日韩三国应当建立更为完善的区域治理体制，力求共同治理传染病、毒品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共建共享一个普遍安全的区域新格局。还应推动变革共同治理新秩序，争取在更多领域达成治理共识，构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气候治理等区域治理新体系，打造东亚命运共同体，并最终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表示，亚洲国家数量众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日韩发展走在亚洲前列，应集聚三方优势，通过“中日韩+X”模式，在产能合作、减贫、灾害管理、节能环保等领域实施联合项目，发挥三方在装备、技术、资金、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各自优势，共同开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场，带动和促进本地区国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总的来说，中日韩三国在全球治理视域下，未来应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东亚，进而服务于全球治理。以区域合作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趋势带动建立政治互信基础，促进文化包容，跨国交流事业繁荣发展，合作领域不断开拓并深化，打造东亚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和谐的区域秩序，进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持世界秩序的正常与稳定做贡献。为了自身的发展、东亚的明天以及世界的美好未来，中日韩三国应当共同努力，一齐以区域治理合作带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五、参考文献：

1. 敖云波著.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外交对策[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08.
2.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01):20-32.
3. 托尼·麦克格鲁, 陈家刚. 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01):33-42.
4. 蔡拓.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01):94-106+207.
5. 杨娜, 王慧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J/OL]. 东北亚论坛:1-12[2020-10-17]. <https://doi.org/10.13654/j.cnki.naf.2020.06.003>.
6. 吴志成. 保持战略定力应对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变化[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0(10):41-45.
7. 吴志成. 中国抗疫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N]. 学习时报, 2020-03-30(001).
8. 吴志成, 王慧婷.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的应对[J]. 天津社会科学, 2020(03):65-70.
9. 吴志成, 刘培东. 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J]. 国际问题研究, 2020(04):20-41+138-139.
10. 马丁·雅克. 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N]. 环球时报, 2020-09-30(014).

11. 刘文革, 杨志文.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J]. 区域与全球发展, 2020, 4(05): 68-80+156-157.
12. 易颜卿. 基于社会问题的全球治理应然与必然探讨[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9): 59-62.
13. 甘橙, 陈金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之“6W”[J]. 社会科学动态, 2020(09): 29-34.
14. 胡江华, 钟瑞添. 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OL]. 江淮论坛, 2020(04): 74-81[2020-10-17]. <https://doi.org/10.16064/j.cnki.cn34-1003/g0.2020.04.010>.
15. 任晶晶. 疫情影响下的中国外交: 凝聚全球共识, 推动国际合作[J]. 东北亚学刊, 2020(05): 23-28.
16. 李仲周. 世界乱局唯一出路: 坚守多边主义, 加强全球公平治理[J].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2020(09): 62-63.
17. 肖祥. 风险社会治理责任范式: 全球战“疫”与中国行动[J]. 学术界, 2020(09): 23-36.
18. 徐海燕, E. N. Grachikov. 全球治理秩序的重构与中国的战略应对——以政治空间嬗变为视角[J]. 学术界, 2020(09): 131-139.
19. 于运全. 论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传播新发展[J/OL].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1-9[2020-10-1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0.1050.C.20200911.1718.002.html>.
20. 李珍刚.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力量: 国际领导力还是全球团结力[J]. 学习论坛, 2020(09): 5-15.
21. 丑则静. 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思想逻辑与实践路径[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0, 36(05): 5-12.
22. 顾明远, 滕珺. 后疫情时代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挑战与新机遇[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 42(09): 3-7+13.
23. 刘建飞, 郑红婕.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导贫困治理国际合作[J]. 中国领导科学, 2020(05): 62-66.
24. 张伟玉, 王志民.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国际发展援助与减贫合作的模式创新[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0(02): 111-124+159-160.
25. 钟声. 同心协力, 打造新型安全伙伴关系[N]. 人民日报, 2018-10-26(003).
26. 王毅. 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 2016-05-31(007).
27. 习近平. 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N]. 人民日报, 2015-11-08(002).
28. 李克强. 在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12-25(002).

第六章 中日韩 FTA 战略信誉困境探析

陈文升⁵⁰

【摘要】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激烈，逆全球化盛行，新冠疫情加重。尽管各国通过大规模财政政策、货币和监管措施避免了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生产生活的长期停滞及不断反弹的疫情仍然使各国的经济表现转为负增长。区域经济一体化似乎势在必行，还有欧盟—日本零关税协定珠玉在前。随着中日韩关系缓和、RCEP 进入签署阶段，中日韩 FTA 的发展也备受期待。

而回顾历史，中日韩 FTA 呼声并非一朝一夕。至今仍面临日本、韩国作为美国盟友可能对中国产生安全威胁，中方不得不以政治、经济手段进行报复，三国陷入战略信誉困境的难题。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中国综合国力长期偏弱仅经济实力突出及中国对于日韩的战略误判。

因此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与谨慎，认清日韩的美国盟友本质，善于利用和扩大盟主与盟友间的困境与矛盾。采取诚意接触、先签后看、借势突破等方式加以应对。而日韩则应采取对冲策略坚定维护自身国家利益。

【关键词】 中日韩 FTA；战略信誉；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对冲策略

一、引言

2016 年，随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特朗普政府认为对华“经济接触”政策十分失败，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不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勤劳奋斗以及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与治理，而是由于美国建制派对中国威胁处置和应对的失败。⁵¹ 特朗普广泛对各国发动关税战、贸易战，试图掀起“逆全球化”潮流，破坏中国的发展环境。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传统盟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加强，采取区域化的“抱团取暖”方式加以应对。其中，欧盟与日本的零关税协定、RCEP 和中日韩 FTA 尤为引起关注。若 RCEP 和中日韩 FTA 得以正式签署，则中国不仅可获得广阔的市场与产业转移环境，更能弱化美国对其周边的围堵。新冠疫情威胁下，据 IMF 预测，2020 全年仅中国 GDP 能保持 1.9% 的正增长，美国为-4.3%，欧元区为-8.3%，日本为-5.3%。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今明两年将出现巨大的负产出缺口和高失业率。⁵²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RCEP 和中日韩 FTA 的签署似乎更有必要。而中日韩 FTA 又面临美国大选、日本首相变更等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大多转变为“应然”研究，即因为

⁵⁰ 陈文升，山东大学 19 级国际政治硕士在读 544369625@qq.com

⁵¹ 李巍：《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外交评论》，2019 年第 5 期，第 54—80 页；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2, 2018, pp. 60—70.

⁵² 报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0: A Long and Difficult Ascent, IMF, October 2020.

中日韩经济合作

种种原因中日韩应尽快促进 FTA 签署。忽略了影响 FTA 建成近十年的“实然”问题，即中日韩 FTA 战略信誉困境问题。

二、中日韩 FTA

（一）影响中日韩 FTA 谈判的积极因素

中日韩三国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历史上三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间远大于战争状态。近代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对中韩实施了殖民与侵略，产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与众多遗留问题。二战后，日韩两国借助美国扶持发展起来，形成了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轴—辐同盟体系。日韩现代化率先完成，转变为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的高科技产业。但本国市场狭小，老龄化考验严峻，难以形成产业规模。中国二战后依靠苏联援助也实现了重工业化、借助改革开放激发了市场活力实现轻工业、农业、重工业齐头并进的局面。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但在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仍受制于人，亟待补齐短板、基本实现现代化。如今美国政府强行利用行政手段，要求美国半导体业与中国脱钩，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每年进口半导体占世界需求近一半的中国放弃抵抗。而波士顿咨询公司作出的评估则指出，这种做法会使得美国半导体公司收入骤降，导致研发和资本支出骤降，进而进入下降螺旋。美国半导体业并不会因此获得垄断优势，而是被产业链的韧性打败，短期导致韩国半导体业得到发展，长期来看则是中国实现半导体业完全自主化。⁵³美国在半导体业对中国的打击也使得中国企业寻求日韩半导体产业进行替代。“由于东北亚区域的中、日、韩三国的阶梯式发展，促成了制造业、技术、信息等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相互转移。日本在资本、尖端技术、工业制成品、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可以为东北亚其他各国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投资。韩国在资本和中间材料的生产上有着较强的优势，在可移动设备和产业技术上也跻身了世界前列。”⁵⁴中日韩三国产业及优势互补明显、物理距离的接近也将形成产业集聚优势与成本优势。中日韩 FTA 市场规模将超越欧盟，占东亚 GDP 的近九成。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合作势必形成扩散效应。加大三国间的民间往来，为超越历史困境达成坚实的民意基础。这将进一步推动三国的政治交往。日韩两国也深知处于美国同盟体系下的自主性困境。无论是出于民意需求还是国家利益，增强自主性都势在必行。

⁵³ BCG, “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https://media-publications.bcg.com/flash/2020-03-07-How-Restrictions-to-Trade-with-China-Could-End-US-Semiconductor-Leadership.pdf>

⁵⁴ 荆磊 祝滨滨，《“逆全球化”背景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与对策》，东疆学刊，2020 年 4 月，第 38 卷第 2 期。

（二）影响中日韩 FTA 谈判的消极因素

中日韩经济一体化的倡议由来已久而障碍丛生。“中日韩自贸协定自 2002 年提出，2012 年启动谈判，迄今三国围绕自由贸易区(FTA)已进行了 16 轮谈判、9 次外长会议和 8 次首脑会议，但仍未达成协议。横亘于协议达成之间的产业竞争性、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美国因素以及近年来频发的贸易摩擦都成为了影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障碍。”⁵⁵

此外，形成历史和解、探索人类区域化的先驱欧盟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欧盟对于各成员国的控制并非强制，而取决于各成员国对于主权让渡的限度。由于统一的政策，有些成员国受惠颇多，而有些成员国反倒因此蒙受损失。区域一体化代价明显，各国相对收益并不确定。也使得中日韩三国在谈判中对于本国收益与风险难以达成一致。

美国宣布进行“亚太再平衡”，利用楔子战略在钓鱼岛、萨德入韩问题上触碰中日韩三国的核心利益。高位政治向低位政治产生了扩散效应，三方经贸关系时而大幅倒退。中韩 FTA 在萨德入韩后也遇冷，未能发挥压舱石作用。三国对于 FTA 作用的乐观估计势必要进行再评估。

日韩两国还面临民主模式失效问题。国内亲美势力、反华势力交织，右翼势力迎合选民而对外采取强硬措施以获得选票。民粹主义通过选票与右翼媒体对信息的控制绑架民意。两国的真实民意不确定性较大，也缺乏政府引导。即便采取有利于中日韩 FTA 的措施，政府换届也会对此产生巨大冲击。

三、战略信誉困境的定义及形成

战略信誉指一国对另一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履行其承诺的相信程度。⁵⁶中日韩三国间存在的战略信誉困境是指日韩两国在安全问题上难以取得中国的信任，而中国因此采取的报复措施特别是经济上的报复措施使得中国对日韩两国在 FTA 问题上的战略信誉较低。

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大国应保持高战略信誉。在同盟理论中，盟国间会出现牵连困境。在中美竞争格局下，日韩本应避免在中美间选边站。而依据 2010 年以来的实践，日韩却并未做出类似选择，反而坚定地站在美国立场推行政策。无论是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还是坚持部署萨德导弹，都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威胁中国国家利益，且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劝阻。中国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只能采取相应措施，如停止两国高层对话、大幅减少对日、对韩进出口贸易额、减少双边民间交往等。中日韩 FTA 谈判进程被美国利用

⁵⁵ 刘文 徐荣丽：《“双轮驱动”自贸区战略与中日韩贸易合作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0 期，第 145 页。

⁵⁶ 曹玮：《战略信誉与韩国的安全政策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3 期，第 11 页。

中日韩经济合作

楔子战略大大推迟，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中日韩三国的互相损耗及猜疑。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中国综合国力长期偏弱仅经济实力突出及中国对于日韩的战略误判。

2010 年中国的 GDP 历史性地超越了日本，尽管国力发展很不均衡，这仍给日本带来很大的震动，甚至打出“日本经济战败”旗号呼吁日本民众奋发。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盟友给予支持。中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冲撞渔船及扣押船长事件。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2012 年及 2013 年，钓鱼岛事件逐渐发酵。随着美国对日本默许及修改安保条约进行支持，日本开始谋求对钓鱼岛的领土主张。中日高层来往完全停滞。这无疑对 2012 年 11 月 20 日宣布启动协商、三方约定在 2013 年举行三轮实质性谈判的 FTA 蒙上阴影。随后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本和韩国也宣布设立自己的防空识别区。三方博弈加深。直到 2015 年中日关系实现缓和，两国领导人恢复了对话。

2015 年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阅兵式上，朴槿惠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登上城楼，站在最前排中央观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阅兵。这是韩国总统第一次出席中国军队的阅兵式。61 年前出现在该位置的人是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与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以朝鲜代表身份出席阅兵式的朝鲜劳动党书记崔龙海站在前排最末端，位置并不显眼。这象征性地展示了当时韩中关系与朝中关系的状况。“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使中韩经济关系更为紧密；韩国陆续归还中国志愿军烈士的遗骸，赢得了来自双方的高度评价。中韩关系一度达到建交以来的最佳时期。”⁵⁷ 中国认为美韩同盟有被置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下的可能，中韩间的经济互信将促进政治互信与安全互信。2016 年，第九轮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于 18 日至 19 日在东京举行，会议未能取得成果，三方约定将在 2016 年 4 月于韩国展开新一轮的谈判。

作为对华前沿的朴槿惠政府与中国过于亲密，不符合美韩同盟平衡中国的目的。因而美国迅速发挥了对韩国政治的影响力。“2016 年 7 月，朴槿惠政府宣布在星州部署“萨德”系统，事前却未与当地政府、民众进行沟通和说服。”⁵⁸ 尽管韩国方面一再强调只针对朝鲜而不针对中国，但其行为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巨大威胁却不是声明可以掩盖的。“在中韩有关萨德问题的争论中，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几乎是处在没有交叉点的平行线上。”⁵⁹ 萨德入韩意味着中韩战略互信的大幅度倒退，中韩在安全领域上的冲突很快扩散至经济、文化交流、民间

⁵⁷ 李柁：《朴槿惠下台：是非功过怎评说》，《世界知识》2017 年第 7 期，第 34 页。

⁵⁸ 李柁：《朴槿惠下台：是非功过怎评说》，《世界知识》2017 年第 7 期，第 32 页。

⁵⁹ 赵立新：《中韩关系：能否迎来“第二个春天”？》，《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第 6 页。

中日韩经济合作

来往等其他领域，双边关系大幅倒退。文在寅上任之初就继续追加了萨德导弹发射车的数量，也并未听取中方取消部署的意见。2017 年 8 月 24 日是中韩建交 25 周年，没有举行两国共同的庆祝活动。这一阶段萨德事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伤害，使中国修正了过去的误判。尽管韩国有加强自主性的尝试及成为政治大国的意愿，但安全利益是核心利益。在中国不结盟政策下，中国是无法同美国一样向韩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因而美韩同盟高于中韩关系且无极端情况并不会走向解体。

尽管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韩国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但在中美竞争面前，两国的实力并不能称为大国。日本缺乏相应的军事实力而韩国经济体量与军事实力都不足。中国的军费支出常年占亚洲军费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的 GDP 更是远超日韩两国 GDP 之和，军费投入更是超过排在其后的近十个国家的军费之和。日本与韩国也并非核国家。在这样不对称同盟结构下，以往对于日韩的自主性程度过于高估，日韩其实无力作出类似法国率先与“红色中国”建交、坚持核武器自主化等措施。在中美实力面前，日韩只能称为小国而非大国。因此对于日韩来说，战略信誉并不重要，对于盟主的忠诚更为重要。尽管这种忠诚会使得日韩陷入牵连困境，但总体的成本要远小于背叛盟主。美国曾对日发起贸易战及强迫签署广场协定，使得日本经济腾飞停滞。在朝鲜的安全威胁面前，中国无法提供安全承诺，日韩都无力承担安全风险。更何况日美与美韩间经济及政治利益盘根错节，美国对两国上层影响力足以影响政府稳定。

对于小国来说，战略信誉并不重要而对盟主的忠诚更为重要。中国是高战略信誉国家，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由于安全威胁和主权威胁，不得不主动实施报复。这种报复导致双边关系的倒退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了自身的战略信誉。日韩对于中国在压力下依然坚持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决心产生怀疑，更加不相信背叛盟主后，中国会采取措施对冲美国带来的压力。

四、战略信誉困境的应对

2018 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来，国际形势发生较大变化。世界包括中国人民自身都看到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及中国综合国力的长足进步。“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话语权大大加强。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及亚投行的设立更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有力补充。一方是逆历史潮流、单边主义的美国，一边是坚定维护全球化进程、奉行多边主义的中国，道义与软实力方面首次出现中国占优的情况。中国通过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大幅降低了对出口的依赖。出口对象国也实现了多元

中日韩经济合作

化。尽管中美贸易出现大幅倒退，中国与东盟反而成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是第三名日本的两倍半。“中国制造 2025”及越受制裁越奋发向上的科技公司使得中国有底气说出“中美贸易战遭受最大损失的是美国企业与民众”。尽管整体实力依然与美军有较大差距，但中国的主战装备如 99A、歼 20、双航母等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使得中国在第一岛链内对美军产生了较大优势。东风 21、东风 41 等核常兼备的战略威慑武器及东风 17 无视任何导弹防御系统的突防武器都对美国及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威慑。中国越来越有底气与自信，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上宣示主权、战之能胜。因而日韩两国逐渐转变思路，采取“对冲”策略，宣布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2019 年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 20 周年，三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在推动 RCEP 签署基础上继续推动落实中日韩 FTA，中日韩经济合作似乎已经进入新时代。

但解决这一困境尚需等待国际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各国不会采取超越自身实力的战略。中国当前的 GDP 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二，军费支出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并不想成为第二个霸权国，且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因此不会取代美国成为日韩的盟主。而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实质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在美日、美韩同盟解体前，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都受美国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在朝韩和平统一、日本修宪拥有战争权之后，也许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才能发展到新阶段。中国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心，不要对日韩增强自主性过于乐观而产生战略误判。中日韩 FTA 建成仍将面临美国的战略压力。

认清美国盟友的本质。尽管相比日本，韩国是正常国家。但韩国的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仍相当缺乏独立性。韩国历来政治清算严重，导致韩国总统甚至成为“高危职业”。美国对于韩国政坛的影响力不容忽视。韩美联合司令部长期以来位于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指挥之下，韩军更是美军一手打造。美韩部队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已经克服与韩军在语言及装备系统上的障碍⁶⁰，而韩军相当缺乏独立指挥与作战经验。尽管韩军人数众多，预备役兵员充足，但失去美国情报及指挥体系的韩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战斗力。因此，在无替代盟主的情况下，韩国并不可能主动脱离美国。韩国选择韩美同盟是结构性的需要，而非意愿问题。中国应该放弃经济解决一切问题的错误思路，避免产生战略误判。萨德事件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续签等都可以看出韩国对美国压力的无力抵抗。要避免韩国对中国形成心理优势，只要韩国明确表达反对但最后总是“迫于无奈”就可以继续获得中国谅解。否则韩国将成为最大受

⁶⁰ J. Digirolamo, U.S.M.C., “Annual exercise strengthens alliance between U.S., ROK marine s”, *Leatherneck*, 2015, 98(6), 12-13. Retrieved from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1689331895?accountid=13813>.

中日韩经济合作

益国，既获得美国安全保障，又获得中国的经济让步。中国付出经济利益后却无法阻止威胁国家安全的美韩同盟行动。

善于利用和扩大盟主与盟友间的困境与矛盾。中国军事实力的稳步增长将继续加大日韩对于牵连困境的担忧。中国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对日韩释放善意。使得日韩意识到中国可能的打击是由于美国同盟的牵连而非中日/中韩两国的战略矛盾。继续提供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双轨制和“相向而行”在解决半岛问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在半岛发挥居间调节的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力，使韩国感受到是中国而非美国在关切韩国的核心利益。凸显美韩同盟视野差异矛盾。中韩两国在面临日本的历史罪行问题是具备相同立场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两国是天然亲善的。而早在中日建交时，中日两国在政治层面就已经放下历史包袱。因此中国在处理日韩问题上相比美国有天然的话语权，这也会加大中国对于日韩的政治影响。而这种影响并非硬实力带来的威逼利诱，而属于隐性的软实力。中国要进一步加强与韩国的经贸往来，美韩经贸合作进程与安全合作相悖，美韩自贸协定谈判暴露双边经济合作困境，而中韩经济合作飞速发展，已经对美韩经贸合作造成冲击⁶¹。美国对中国在半导体上的限制与制裁会使得中国寻求日韩半导体作为补充替代。在美国严格限制高新科技出口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离不开日韩两国。双边的经贸规模还将持续扩大，这也会加大美韩/美日同盟的同一性困境。

诚意接触、先签后看。无论是出于缓解地缘政治压力还是出于实现本国产业链向上游攀升的目的，中方都应坚定不移地推动 RCEP 及中日韩 FTA 的谈判签署。中方对于未来的世界形势有着清晰的判断，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不会改变。因此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既然是双循环而非单循环，就应坚定不移、亲诚惠容地与全球伙伴加深经贸往来。这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

即便三国间贸易额再大，经济交融程度再深，若再次出现类似萨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威胁国家安全与主权的事件，中国与日韩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交往仍将大幅倒退。这是过去的实践为中方带来的经验。但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国家关系，随着中国自身国力的不断增强，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终将被打破。日韩是否仍会采取忠诚于盟主的选择仍需观察。尽管中韩 FTA 在萨德入韩后遇冷，但并没有一方撕毁条约。随着两国关系的转圜，中韩 FTA 仍将为两国经济发展与民间往来做出巨大贡献。因而，中日韩 FTA 也许仍将面临美国因素挑战，但只要中日韩关系博弈后再次改善，依然能发挥效力。何况中日韩 FTA 本身就

⁶¹ 沈童：《非对称同盟理论视角下的美韩同盟新困境》，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6月，第6页。

可作为三国间的润滑剂与回转空间，其成功签署会进一步降低中日韩三国发生“硬磨擦”乃至碰撞的可能性。

借势而为。新冠疫情的到来加速了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预计将成为唯一正增长国家。2020 年中国的 GDP 与美国的差距势必将实现跨越式缩小。日韩两国出于国家利益考量，亟需中国稳定的市场与产业链增强本国经济。美国与欧洲短期内仍将难以走出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在疫苗研发上的领先也将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中日韩区域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中日韩三国都较快地摆脱了疫情的影响，实现复工复产复学。东北亚在疫情防控上的领先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大动力。中国虽然最先遭受疫情打击，使产业撤离中国的呼声渐高，而当疫情扩散到世界，中国对疫情的快速控制恰恰证明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优势所在。中国借助疫情这一特殊事件造成的影响将促进 FTA 谈判进程。

对冲策略。日本和韩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日美同盟、日韩同盟的存在使得日本和韩国无法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国策。尽管日韩都在不同程度上寻求加强自身独立性，但美国同时也在寻求深化同盟乃至形成美日韩三边同盟以遏制中国。经济上，美国提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⁶²，拉拢日韩共同实现“去中国化”。日本也不得不进行表态，要求在华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并在财政预算中拿出 2200 亿日元用于补贴这些企业。美国国内政治危机、金融危机与公共健康危机交织，可靠性下降。而中国的地缘优势以及规模体量又使得日韩不得不采取对冲战略。中日韩三国在推进 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方面都加强了共识，期望在今年实现签署。

五、参考文献

1. 李巍. 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 36(05):54-80+6.
2. 荆磊, 祝滨滨. “逆全球化”背景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与对策[J]. 东疆学刊, 2020, 37(02):74-79.
3. 刘文, 徐荣丽. “双轮驱动”自贸区战略与中日韩贸易合作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10):144-151.
4. 曹玮. 战略信誉与韩国的安全政策选择[J].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03):1-46.
5. 李枏. 朴槿惠下台:是非功过怎评说[J]. 世界知识, 2017(07):32-34.
6. 赵立新. 中韩关系:能否迎来“第二个春天”?[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53(02):5-15+140.
7. 沈童. 非对称同盟理论视角下的美韩同盟新困境[D]. 外交学院, 2015.

⁶² 笪志刚,《美国给日韩出了大难题》, 环球时报, 2020 年 5 月 30 日, 第 7 版。

中日韩经济合作

8. 笄志刚. 美国给日韩出了大难题[N]. 环球时报, 2020-05-30(007).
9. Kurt M Campbell,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J]. Foreign Affairs, 2018, 97(2).
10.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0: A Long and Difficult Ascent[EB/OL], IMF, October 2020.
11. BCG. 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EB/OL]. 2020, <https://media-publications.bcg.com/flash/2020-03-07-How-Restrictions-to-Trade-with-China-Could-End-US-Semiconductor-Leadership.pdf>.

第七章 中日韩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研究⁶³

刘星彤 苏畅 李美君⁶⁴

【摘要】 本文运用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中日韩制造业 GVC 位置指数、GVC 参与度指数以及 NRCA 指数。从整体层面来看，中国在中日韩全球价值链地位中排名第三，但三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从细分行业来看，中日韩三国的制造业有错位发展空间。因此，中日韩应该建立产业互联网，增强区域合作，提升三国在 GVC 中的竞争力。同时中国应提供良好市场环境、落实人才政策，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运用数字经济对价值链的影响机制促进中、低技术制造业发展。

【关键词】 中日韩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一、引言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建立与完善，全球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入，国家间生产网络联系愈发紧密，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点。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跨国投资增长乏力，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受到挑战。尤其是进入 2020 年以来，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与日趋激烈的贸易摩擦，信息化向传统产业全面渗透，以云计算、工业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跨界创新成为了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展现出综合区域化、链群化和备份化的趋势，逐渐形成以主要大国为核心，临近经济体为协同的产业链大区节点。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主要的经济体，GDP 总量逾 15 万亿美元，合计约占东亚经济总量的 87.3%，三国间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中日韩三国自 1999 年 11 月开始在 10+3 框架下合作，迄今为止，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已经举行了八次，2019 年 12 月 24 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共同确立了全新的未来合作框架，如何在进一步的合作中利用好中日韩三国各自的竞争优势成为了当前中日韩经贸往来的主题。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支撑，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较强，因此制造业及其配套技术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体现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中日韩三国作为制造业

⁶³ 本项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批准号：G2020203004）。

⁶⁴ 刘星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电子邮件：19021073@bfsu.edu.cn；苏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电子邮件：19021082@bfsu.edu.cn；李美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电子邮件：19021074@bfsu.edu.cn

大国，制造业多年来一直占据本国总产值的重要比重，从 2000 年到 2019 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中占比保持在 19%到 23%之间，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中占比在 24%到 28%之间波动，中国这一比重更大，处于 27%到 32%的区间之内。此外，该三国制造业在全球总体制造业中地位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⁶⁵，2004 年中日韩制造业增加值为 1.859 亿元，占全球的 25.56%，此后该比重稳步上涨，2019 年中日韩制造业增加值为 5.35 万亿美元，占世界总增加值的 41.77%⁶⁶。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近年来我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从 2012 年“云计算”被写入《“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5 年“中国制造 2025”战略发布到 2016 年《智能制造“十三五”发展规划》出台，2017 年“数字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卓有成效。2019 年其增加值规模已达 35.8 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 36.2%⁶⁷。进入 2020 年之后，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陆续发布了《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将中日韩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错位互补的合作路径分析置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下十分必要。

本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以及贸易增加值的角度出发，根据 Wang 在 WWZ 理论模型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指标对中日韩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三者之间真实的经贸依存关系，结合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机制，对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升级路径以及中日韩制造业在和合作提出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全球价值链计算方法的研究综述

对增加值贸易角度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 GVC）的关注开始于 Hummels 等(2001)，学者们通过构建 HIY 方法，在多国之间的中间品往来不存在增加值返回和进口的中间品在国内交易和出口时的生产投入结构相同的假设基础上评估国家间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为弥补此模型脱离现实的缺陷，Koopman 等（2008）将投入产出系数分为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与国内交易三种类别，构建了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多国核算框架，在此基

⁶⁵ 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的统计从 2004 年开始，因此这里选取了 2004 年的现价美元数据进行相关说明。

⁶⁶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CD>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ZS>

⁶⁷ 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http://www.aia-alliance.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document_download&ftype=3&fid=1668&fno=0。

基础上, Koopman 等 (2010) 基于 GTAP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数据库和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构建了 KPWW 方法, 将一国的贸易总出口分解为 5 个增加值部分, 计算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参与程度。随后 Koopman 等 (2014) 继续改进该方法, 将一国或地区的总出口拓展为 9 项不同的增加值和重复核算项, 并吸收了 Johnson 和 Noguera (2012) 提出的 “增加值出口” 等相关指标, 有效的反映了一国或地区贸易失衡的程度以及真实出口规模。Wang 等 (2013, 2015) 延申了 KPWW 分解方法的视角, 建立了 WWZ 方法, 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 (Domestic Value Added, 简称 DVA)、国外增加值 (Foreign Value Added, 简称 FVA)、先出口再返回国内的增加值 (Returned Value Added, 简称 RVA) 和纯重复计算的部分 (Pure Double Counting, 简称 PDC), 在国家—部门层面、双边层面和双边—部门层面再将其分解为 16 个更细的部分。Wang 等 (2017) 还提出了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New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简称 NRCA), 与垂直专业化率、相对出口贡献指数、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数和参与度指数一起更加全面的测度一国或地区出口中的增加值贡献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趋势。为了对中日韩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和三者之间相对竞争力进行更加客观的阐述, 本文运用 Wang 等建立的较为完善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分析中日韩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的地位和参与程度。

(二) 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综述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Don Tapscott (1995) 所著的《数字经济》一书中, 此后 “数字经济” 这个词主要反映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经济过程。目前业界对数字经济的界定不甚严格, 但大体都可以归结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进行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既覆盖信息产业也包括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 学者们多将数字技术投入当作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来评估其对经济增长的效用。例如李馥伊 (2018) 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路径; 裘莹等 (2019) 剖析了我国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化趋势推进价值链攀升的机制; 何文彬 (2020) 则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高端化的价值链重构效应。

在 Gereffi & Fernandez-Stark (2019) 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中, 影响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因素可以归结为投入产出结构、地理范围、领导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治理结构、参与 GVC 企业的升级路径、本地制度质量与利益相关者等。在当前全球制造业信息化转型日益发展的趋势下, 相关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也是影响一国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全球

价值链的影响机制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数字经济直接影响制造业 GVC 地位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可以直接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来影响价值链结构，例如智能手机和 AI 感应设备等新产品会因为数字化技术的投入直接促进价值链结构中产品的升级。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投入会促进产业链的结构性转型，传统企业可能通过新技术完善生产流程，从而完成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从低到高的攀升。

2. 数字经济通过改变要素禀赋影响制造业 GVC 地位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利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科技提升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单位人力资源成本，改变了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布局结构。此外，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拓宽了劳动力的自主学习渠道，间接的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

3. 数字经济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影响制造业 GVC 地位升级

中间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比重非常大，由于其交易过程中需要多次跨境运输，因此贸易成本强烈影响了全球价值链形态。数字经济可以将通过智能物流降低运输和仓储成本，从客观上削弱了地理位置在交易中的影响，缩短了价值链长度，并且促进了再外包需求的产生。

（三）创新点

通过梳理全球价值链和数字经济的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重点在于模型的搭建与应用，在研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与升级路径时也大多将某一国或地区置于世界范围的大环境，涉及几国的对比研究的文章比较少。有关数字经济的文献侧重于从专业角度论述新一代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将数字经济作为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因素来论述的研究不多。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全球价值链的分析置于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利用目前最符合现实条件的 WWZ 模型分别测算出中日韩整体的制造业相关数据和三国各自制造业的相关数据，结合数字经济影响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参与度的趋势，为中日韩日后续经贸合作的升级和中国制造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建议。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基于 WIOD2016 数据库和 ADBMRIO 数据库初步处理出的 UIBE GVC 数据库，利用 Wang（2017）在 WWZ 分解模型基础上提出的国家部门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参与度核

算方法,从贸易附加值的角度对中日韩三个国家的以下三个指标的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进行测算。

(一)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该指数是利用 UIBE GVC 数据库中初步测算出的上游度指标和下游度指标, 计算出的全球价值链中的细分行业位置指数和整体位置指数。一国或者一个行业的 GVC_Position 指数越大, 则该国或者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就越偏向上游。

(二)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该指数是运用 UIBE GVC 数据库测算出的细分行业参与度指数, 一国或地区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是该国该产业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比值。参与度指数越大, 表明该国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 在全球生产中的地位则更高。

其中, 代表 r 国 i 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 代表 r 国 i 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参与度。当 r 国 i 行业前向参与度高时也就是数值较大时, 意味着该国该行业的国内增加值较多地以中间品的身份出口; 相反, 当 r 国 i 行业的后向参与度高也就是数值较大时, 意味着该国该行业离消费端更近, 来自第三个国家的中间品投入较多。

(三) 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NRCA

Wang et al. (2014) 从增加值角度提出了一个用来评估贸易竞争力的新指数——NRCA 指数, 也被称作“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 指数在传统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的基础上, 引入了增加值的视角, 能够较好衡量该国家某种产业的贸易竞争力。因此本文引入 NRCA 指数, 从数据上客观评估中日韩三国的产业比较优势。公式为:

其中, X_{si} 是指 s 国 i 产业的增加值出口额, 代表在 s 国所有产业向其他所有国家出口的增加值额的加总。 X_{wi} 是指在整个世界上, i 产业的所有增加值出口, 代表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产业产生的所有增加值。NRCA 越大, 表明该国该产业的贸易竞争力越强。

(四)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按照《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2016 version WIOD sector description), 选取 C5-C23 的数据作为制造业计算的样本数据。由于中日韩三国在行业 C23 中数据全部为 0, 所以选择删去行业 C23, 即统计 C5-C22 共 18 个行业数据。具体见表 7-1。

表 7-1 制造业细分行业对照表

序号	行业（部门）	序号	行业（部门）
C05	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制造	C14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C06	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制造	C15	基本金属制造
C07	木材、木材制品及软木制品的制造 (家具除外)、草编制品及编织材料物品 制造	C16	机械设备除外的金属制品制造
C08	纸和纸制品制造业	C17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
C09	记录媒介物的印刷及复制	C18	电力设备制造
C10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C19	未另分类的机械和设备制造
C11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	C20	汽车、挂车和半挂车制造
C12	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制造	C21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C13	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	C22	家具制造；其他制造

资料来源：《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2016 version WIOD sector description）

根据 WIOD 数据库中 ISIC REV. 4 的产业分类方法，进一步将制造业细分为四大类：高技术制造业（C12、C17）、中高技术制造业（C11、C18、C19、C20、C21）、中低技术制造业（C10、C13、C14、C15、C16、C21）和低技术制造业（C5、C6、C7、C8、C9、C22），由于 C21（其他运输设备制造）既在中高技术行业，又在中低技术行业，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中低技术制造业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合并为中技术制造业。具体见表 7-2。

表 7-2 制造业按技术含量分类对照表

行业分类标准	高技术	中高技术	中低技术	低技术
制造业	C12（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制造），C17（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	C11（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C18（电力设备制造），C19（未另分类的机械和设备制造），C20（汽车、挂车和半挂车制造），C21（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C10（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C13（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C14（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C15（基本金属制造），C16（机械设备除外的金属制品制造），C21（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C5（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制造），C6（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制造），C7（木材、木材制品及软木制品的制造），C8（纸和纸制品制造业），C9（记录媒介物的印刷及复制），C22（家具制造；其他制造）

资料来源：ISIC REV. 4

四、计算结果与分析

在 UIBE GVC 数据库的基础上，本文在测算了中日韩三国 2000-2014 年的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参与度指数之后，根据每个国家的细分行业产值所占本国总产值的比例计算出该行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以此为权重计算出中日韩三国国家整体位置指数和参与度指数。

（一）中日韩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1、中日韩制造业整体位置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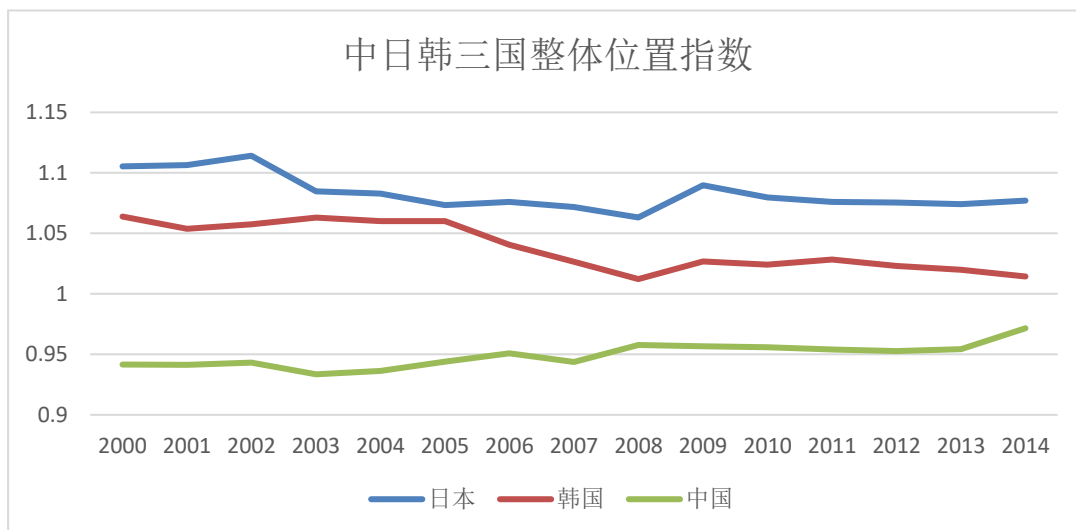


图 7-1 中日韩三国整体位置指数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7-1 为 2000-2014 年中日韩三国国家整体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变化趋势，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日本整体 GVC 位置较高，其次是韩国，中国最低。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三国的 GVC 位置指数均呈现小幅度波动的趋势，但日本和韩国的 GVC 位置指数整体是下降的，中国的 GVC 位置呈现上升的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小。总体而言，日本的 GVC 位置稍高于韩国，两个国家均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上游位置，而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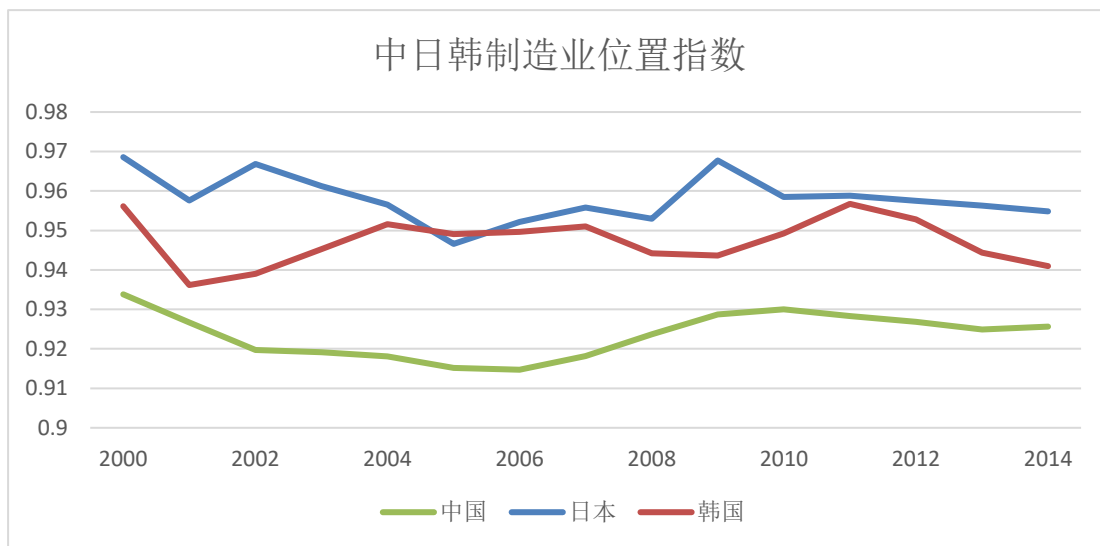


图 7-2 中日韩三国制造业位置指数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7-2 为 2000-2014 年中日韩三国制造业位置指数的变化趋势，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制造业 GVC 位置指数高于韩国，且二者均大于中国。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在 2000-2005 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6-2009 年又开始回升，2010 年又出现小幅度下降。原因是

中日韩经济合作

2001 年中国加入到 WTO 后，加快了加工贸易的步伐，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下降。2006 年以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中国向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地区转移，且中国贸易经济转型，向中高技术产业升级，使得 GVC 制造业地位上升；日本在 2000–2005 年出现了下滑趋势，因为日本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原本停滞的实体经济面临较大的困境，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疲软，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但 2006 年之后又略有提升，日本采取的“经济复苏”计划略有成效。日本在 2009 年之后 GVC 位置又略有下降；韩国位置指数在 2000 年和 2007 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前者是因为韩国 1991 年进入经济转型调整期，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导致外贸依存度过高，后者是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GVC 位置指数下滑。

从图 7-1 和图 7-2 均可看出，中国与日韩两国无论在国家整体 GVC 和制造业 GVC 上的差距都在逐渐缩小。近年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国家对数字经济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出台数项有关政策。数字经济的传导机制和现实情况均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提升。

2、中日韩制造业分行业位置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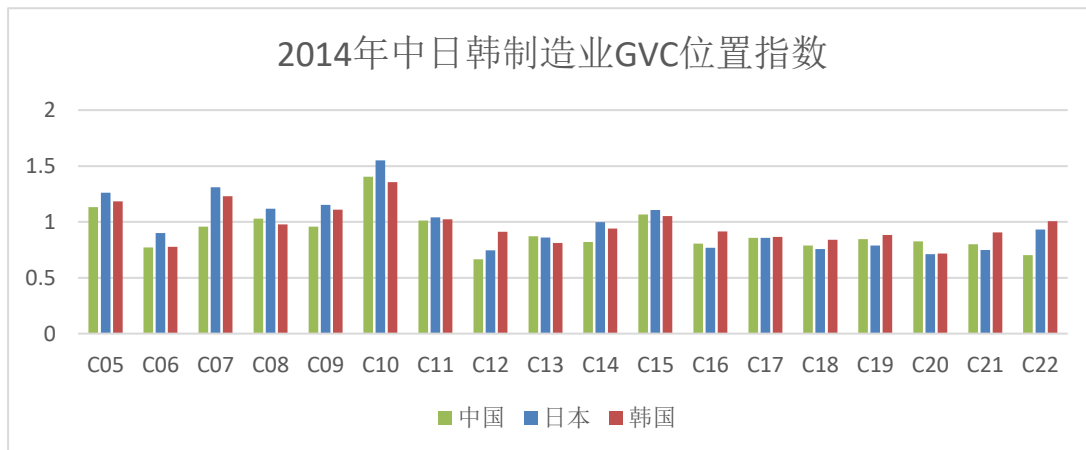


图 7-3 中日韩制造业细分行业位置指数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以 2014 年为例进行中日韩三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横向对比，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位置指数基本是高于中国的，这说明两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均处于比中国高的位置。从中国制造业内部各部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 C05（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制造），C08（纸和纸制品制造业），C10（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C15（基本金属制造）高于中国制造业整体的位置指数，且 C16–C22 的行业明显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位置。可能

中日韩经济合作

是因为 C16-C22 属于中高技术的制造业部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这些行业上产出的贸易附加值还有一定差距。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可与电子商务结合，使得更低成本、更高效地进入高附加值领域成为可能。以 C05（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制造）为例，相较于中国老牌食品制造业企业，三只松鼠与数字经济结合，在可控成本的前提下更贴近客户需求实现定制化的生产，也带来了 GVC 地位的提升。

（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1、中日韩制造业整体参与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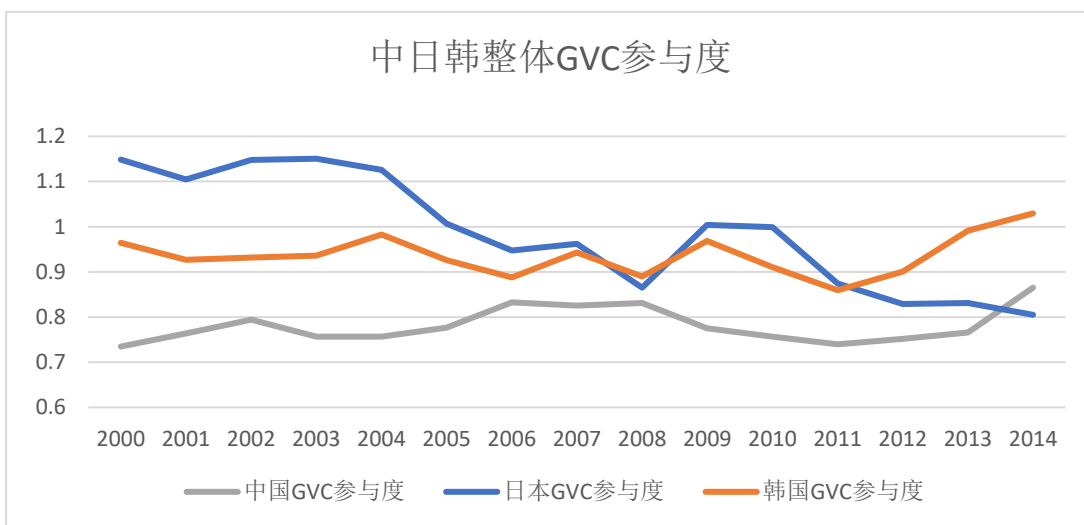


图 7-4 中日韩整体 GVC 参与度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7-4 为 2000-2014 年中日韩三国国家层面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变化趋势，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日本整体 GVC 参与度较高，其次是韩国，中国最低。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日本的 GVC 参与度呈现下降趋势，韩国在 0.9-1 之间进行小幅度波动，中国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三者随着时间逐渐交汇，2014 年韩国和中国的参与度均超过了日本，说明三国在 GVC 参与程度上的差距正逐渐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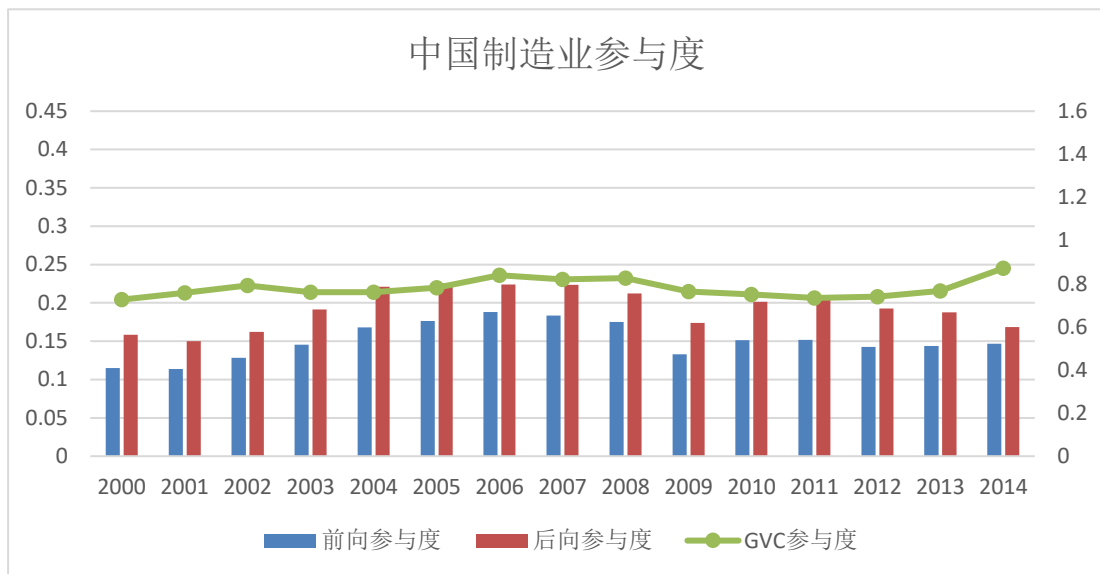


图 7-5 中国制造业参与度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7-5 为中国制造业 2000-2014 年间的制造业参与度，从静态来看，中国制造业每年的后向参与度高于前向参与度，说明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出口的中间产品存在较高的依赖；从动态来看，两个参与度的指标呈现轻微的“倒 U 型”趋势，前八年逐步上升，在 2008 年左右达到高点而后下降，说明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出口都在一定程度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的 GVC 参与度近年来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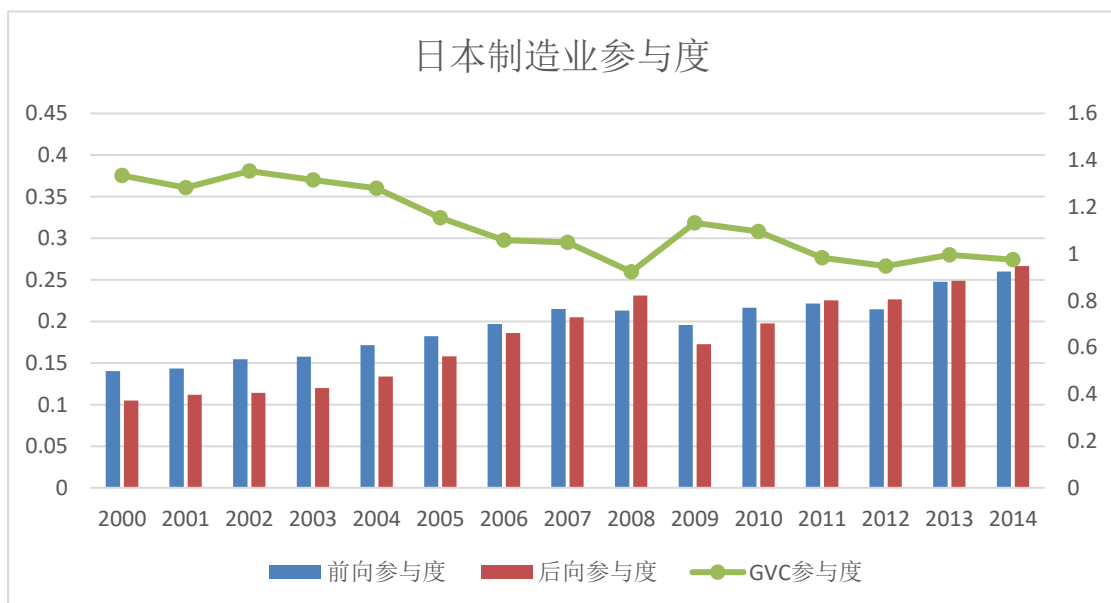


图 7-6 日本制造业参与度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7-6 为日本制造业 2000-2014 年间参与度，在 15 年间的前半段，日本的前向参与度

中日韩经济合作

明显大于后向参与度，后半段两个指标差距缩小甚至后向参与度逐步超过了前向参与度，整个趋势也是稳步上升的。从图中折线表示的 GVC 参与度来看，日本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逐步下降，在 2008 年也存在一个明显的低点，2009 年之后虽然有所回升但整体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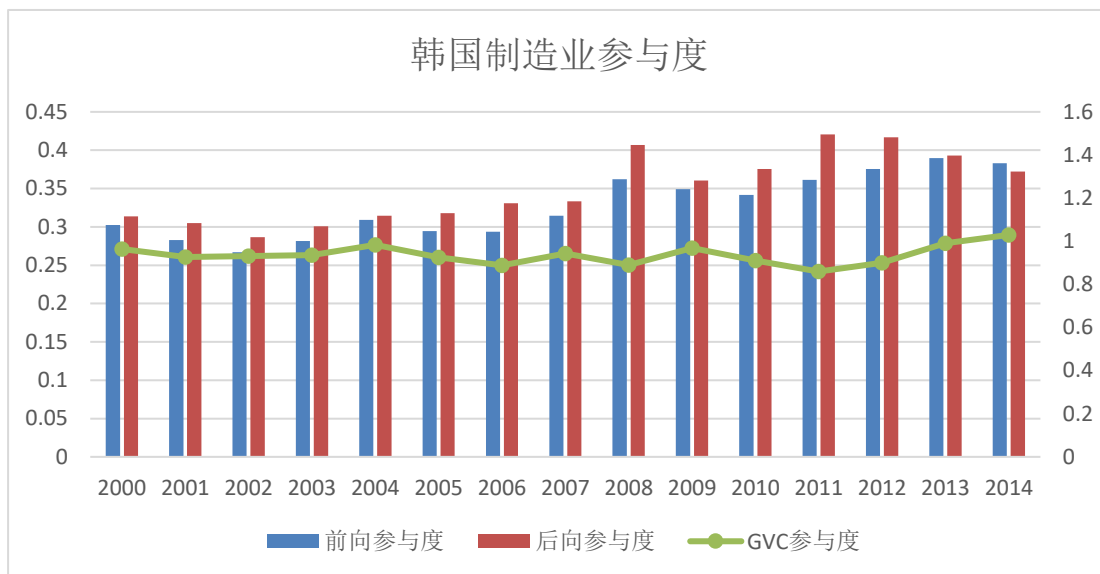


图 7-7 韩国制造业参与度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7-7 为韩国制造业参与度，2001-2014 年之间韩国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大部分年份的后向参与度大于前向参与度，与日本和中国的相关数据相比整体呈现较高水平，同时 GVC 参与度较为平稳。

2、中日韩制造业分行业参与度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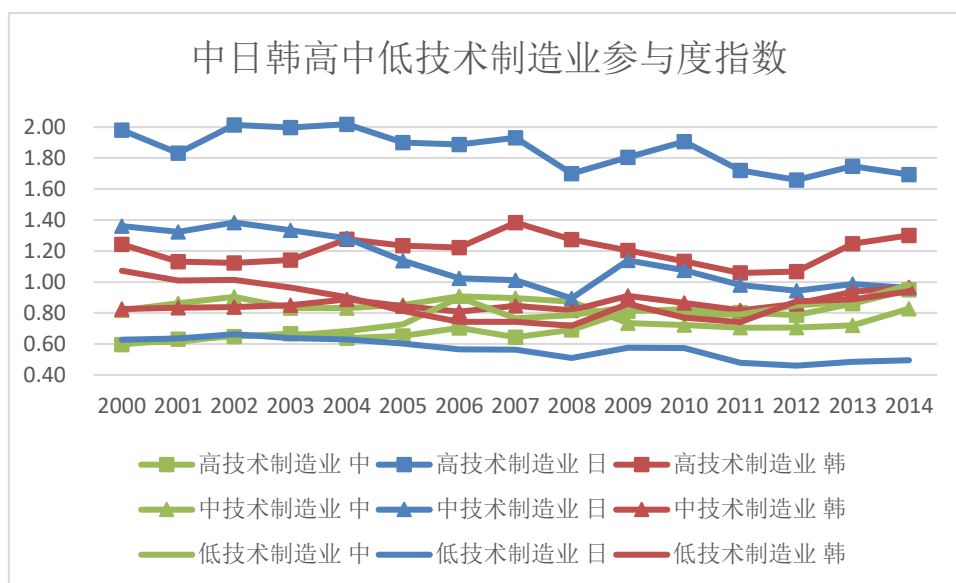


图 7-8 中日韩高中低技术制造业参与度指数

中日韩经济合作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7-8 为 2000–2014 年中日韩三国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三类技术制造业的 GVC 嵌入模式各不相同。在高新技术制造业中，日本和韩国以前向嵌入模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即间接附加值出口的比重较大。这是因为日韩最终出口的产品中囊括了世界多国的生产制造环节，每一生产工序都带来了相应的价值增值。尤其是日本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主，在 GVC 分工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出口的产品在 GVC 的不同层次实现了多次跨越，GVC 分工越来越精细，价值链也不断延伸。所以日本的参与度在三国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中处于第一。但近年来，日本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创新优势逐渐丧失，电子产品等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导致日本出口中的核心零部件的种类逐年减少。因此，近年来日本的 GVC 参与度逐渐下降。中国起初以后向嵌入模式为主，但随着时间呈现出增长趋势，在 2014 年参与度已经接近于 1，这说明中国的前向参与度在增加，这说明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稳步增长。

中技术制造业中，日本的参与度依旧处于第一，但在 GVC 参与程度方面依旧低于高新技术制造业。中韩在中技术制造业方面参与程度在金融危机之前较为稳定，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参与 GVC 程度稍稍减弱，韩国却提高了 GVC 参与度。

低技术制造业中，韩国参与 GVC 的程度最高，这源于其贸易发展历史悠久，全球价值链拉长。但中国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也逐年加深，与韩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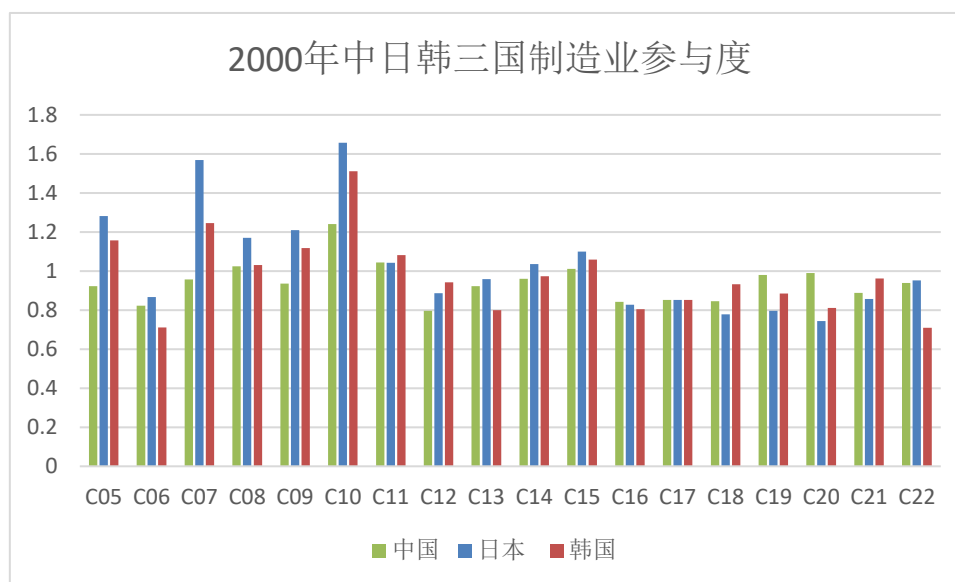


图 7-9 中日韩 2000 年制造业细分行业参与度对比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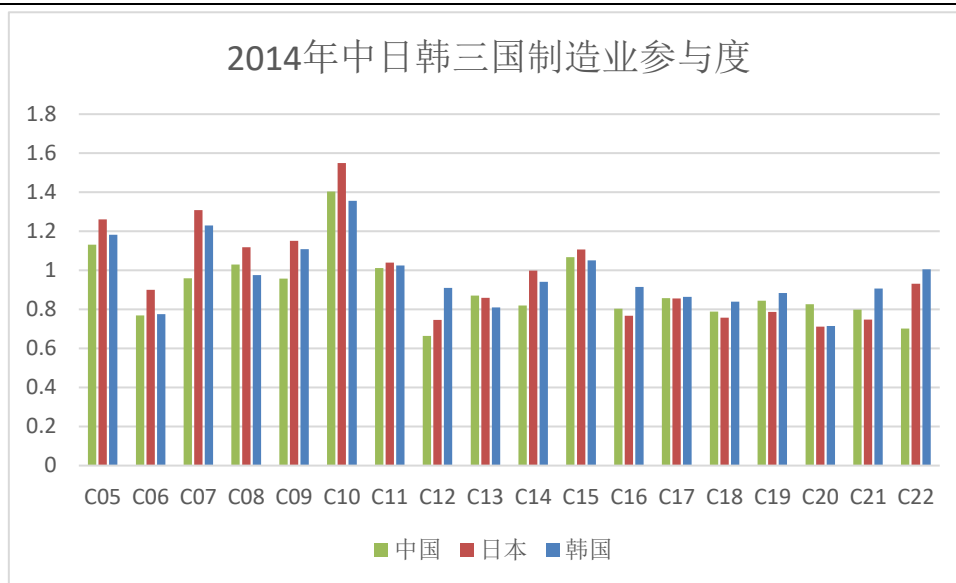


图 7-10 中日韩 2014 年制造业细分行业参与度对比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 7-10 是 2014 年中日韩静态的制造业细分行业参与度比较，中国在 C05（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制造）、C07（木材、木材制品及软木制品的制造）、C12（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制造）、C22（家具制造，其他制造）行业中参与度最高，韩国在 C06（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制造）、C08（纸和纸制品制造业）、C10（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C11（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C13（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C14（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C15（基本金属制造）等行业最高，其余行业日本的参与度最高。

从动态来看，2000 年到 2014 年，中国制造业大部分细分行业参与 GVC 的程度均出现了明显提升的相似特征。尤其是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电子、电器与光学设备制造业的，纺织、皮革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的参与指数都有了明显加强。但日本的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电子、电器与光学设备制造业的参与度指数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相对于中韩来说，优势依然显著。韩国的电力设备制造业和汽车、挂车制造业参与 GVC 程度明显加深。

根据图 7-8、图 7-9、图 7-10 可得出，中国在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上 GVC 参与程度逐年加深。高技术制造业受数字化程度、信息技术程度影响较大，研发经费也多是投入到化学品制造业、电子、电器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在这些行业的产业升级的速度，并相对提升了这些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而对于低技术制造业而言，将出口产品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根据数字经济传导机制和现实情况可知，可以降低单位人力劳动成本和贸易成本，使得下游部门的产品竞争力得到增强，国内增

加值稳步增长。

（三）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NRCA

中日韩三国在 2000 年和 2014 年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 NRCA 指数如图 7-11 所示。可以得到以下结论：2000 年，中国在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制造业以及家具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的 NRCA 指数较高，日本在电力设备制造业和汽车、挂车和半挂车制造业具有较高的 NRCA 指数，而韩国在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以及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2014 年，中国制造业的新显性比较优势均值明显上升，与日韩在某些领域的差距逐渐缩小，如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的 NRCA 指数由原来的 1.06 提高到 1.84，但是在家具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明显下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在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领域的 NRCA 指数有所上升，但是在这一领域，与中国和日本相比，韩国仍具有相当地位的比较优势。日本在汽车、挂车和半挂车制造领域的 NRCA 指数明显增长，较 2000 年有较大优势。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2000 年到 2014 年，日本在中技术制造业的 NRCA 指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韩国在高技术制造业的 NRCA 有小幅度增长，在中技术制造业方面的 NRCA 指数有下降趋势。同时，经济增长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不断上升，到 2014 年，中国在中、高技术制造业的 NRCA 指数都有较高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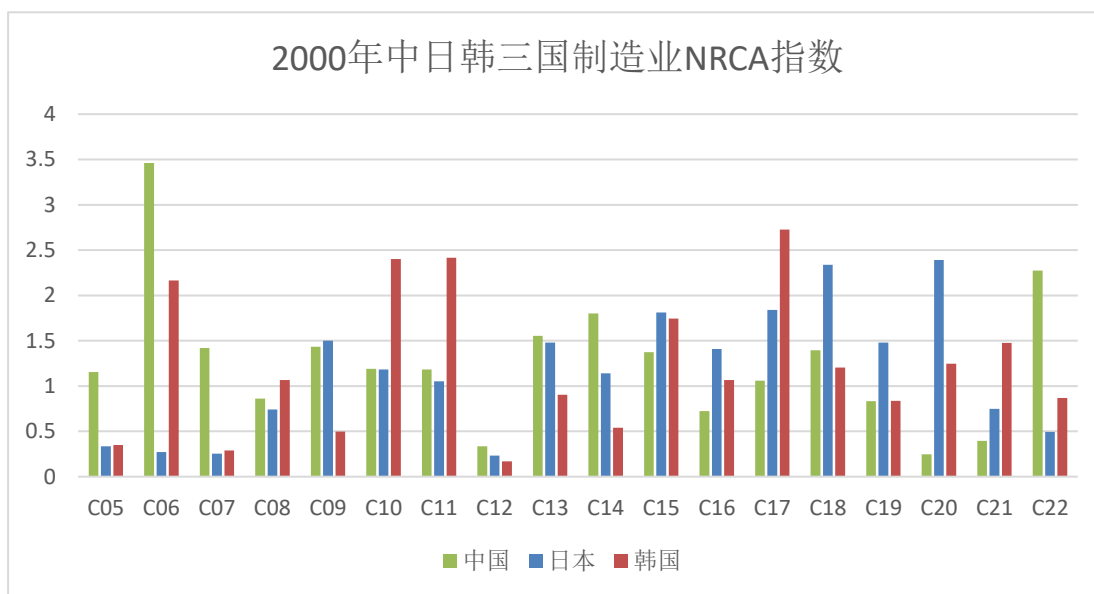


图 7-11 中日韩制造业 NRCA 指数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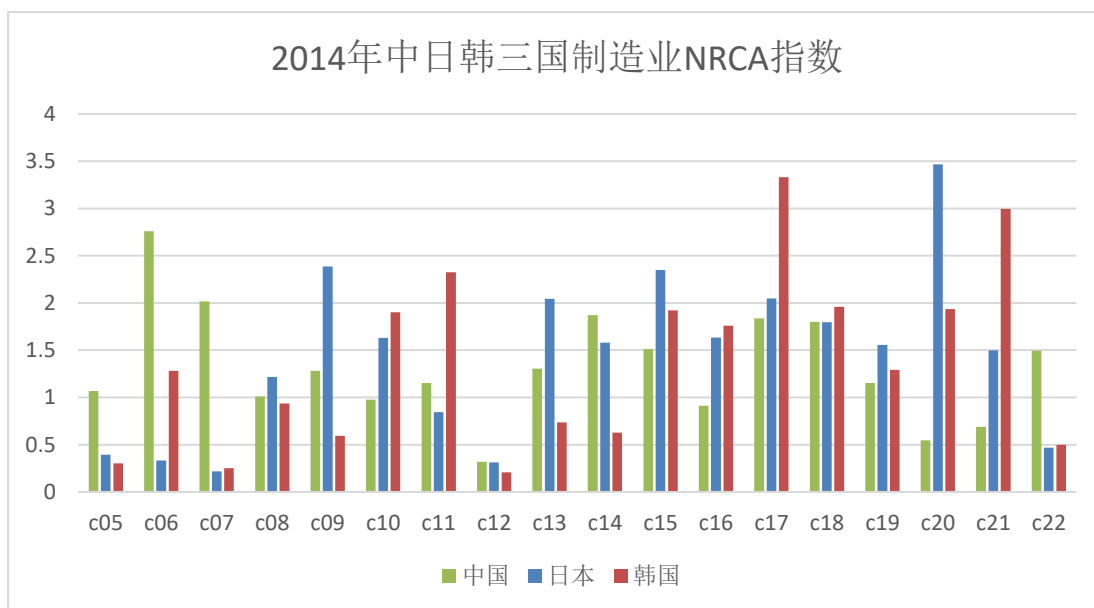


图 7-12 2014 年中日韩制造业 NRCA 指数

数据来源：基于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所得

五、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整体参与度来看，中日韩三国在世界上的价值链地位并不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随着经济增长、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等外界因素浮现，中日韩三国在世界上的价值链地位都有所提高。另外，在制造业的细分行业中，中、日、韩三国各有擅长之处，这种现状意味着中日韩三国在未来的区域合作过程中仍具有许多潜力与巨大发展空间。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中日韩三国的制造业有错位发展空间，具有独特的互补优势。虽然中日韩三国制造业的 GVC 地位在 2000–2014 年间有较大变化，但整体来说，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相较于中国，日韩仍具有明显优势。当然，中国制造业中的技术含量也有明显提高，在保持着低技术制造业稳定发展的同时，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程度与日韩的 GVC 地位差距逐渐缩小。

根据以上分析，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视角，针对提升中日韩制造业的协作水平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本文提出如下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三国在价值链的互补优势，提高三国在制造业的协作水平

东亚地区的发展一直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影响，但是近年来，人口红利、交易红利逐渐消失，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举步维艰，但是作为中日韩三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传统制造业不应该是产业中被放弃的一环。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波动，证明了一国或者一个区域内拥有完整产业链的重要性。据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中日韩三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同位置，形成彼此错位互补的优势，提高三国间产业的协作水平，有助于加强进一步提升中日韩三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虽然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在中日韩三国中处于劣势地位，但是由于具有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可以为中日韩三国制造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平台。

具体来说，中日韩三国的制造业不应该是简单地把消费品投入市场，从原来单纯地向国内、国际市场倾卸商品，转向供应链带动市场发展，延伸产业价值链，促进产业互联网发展。利用互联网打通供应链之间封闭的环节，比如可以从最原始的生产环节及凭证单据开始，将其全部上传至系统，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对产业中发展较差的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迎合数字化发展趋势，打造出一个将生产链、供应链、商流、物流结合起来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优化劳动资本占比，降低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促进中日韩三国价值链升级。

（二）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1. 提供良好环境和人才支持，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

根据对中日韩制造业细分行业中 GVC 参与度的分析，2000-2014 年中国在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纺织、皮革制造业和家具制造业的参与度指数有明显提升，且根据测算出的 NRCA 指数，中国在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的新显性比较优势也在逐渐上升，不难推测，中国在未来也会继续加大对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的支持力度，现实中，中国确实在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比如通过华为等龙头企业的发展，提高中国这些行业的国际知名度，有助于提升中国在该行业中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为了继续提高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中国不仅要对一些代表性企业进行政策倾斜，给予鼓励扶持的政策支持手段，还应该对一些正在发展中或具有优质创意的中小型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为海外留学人才、国内高级人才提供完善的落户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人才支持，促使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摆脱原来动力不足的生产模式，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过程中去。

2. 直接引入数字经济设备，提升中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

在中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在 C14 行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和 C18 行业（电力设备制造业）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较高。其中电力设备制造业属于中高技术制造业，相比属于中低制造业的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电力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高，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度低。因此，为提高中国中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国际竞争力,可以尝试将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进中技术制造业中,比如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下,直接投入 AI 设备及智能生产机器等新产品,通过引入数字化技术直接促进价值链结构中产品升级,完善中技术制造业的生产流程,促使中技术制造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3.通过数字经济改变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提升低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

在低技术制造业中,与日韩相比,中国在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品制造业以及木材、木材制品及软木制品制造业中占据明显优势地位。总体来看,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韩国相比较低,但是差距在不断缩小。低技术制造业具有技术含量低、劳动和资本含量高的特点,受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变化影响较大。数字经济可以降低单位人力资源成本、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通过改变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影响低技术制造业的 GVC 地位。因此,在低技术制造业中,可以利用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运用云计算、云学习等新科技,提高低技术制造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并通过加入现有的智能物流、智慧供应链平台,通过数据分析,为厂商提供最优库存管理决策支持,降低贸易成本,解决传统低技术制造业产能过剩、产品滞销的生产局面,提升国际化参与度,进一步促进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

六、参考文献

1. Hummels D., Ishii J., Yi K.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4:75-96.
2. Koopman R., Wang, Zhi., Wei, S. J. 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cc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109, 2008.
3. 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Wei S.J.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426, 2010.
4. Johnson R.C., 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2): 224-36.
5.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 : 459-494.
6. Wang, Z., Wei, S. J., Zhu, K. F.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677, 2013.

7. 王直, 魏尚进, 祝坤福. 总贸易核算法: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09): 108-127+205-206.
8. Wang Z, Wei S J, Yu X.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9. Wang Z, Wei S J, Yu X. 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 NBER Working Paper, 2017.
10. Tapscott D.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M].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1995: 156-168.
11. 李馥伊. 中国制造业及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与升级[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
12. 裘莹, 郭周明. 数字经济推进我国中小企业价值链攀升的机制与政策研究[J]. 国际贸易, 2019 (11): 12-20+66.
13. 何文彬. 全球价值链视域下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升级重构效应分析[J]. 亚太经济, 2020 (03): 115-130+152.
14. Gereffi G, Fernandez-Stark K.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 a primer[M]. Chapter 2 from Handbook on Global Value Chains. Edited by Stefano Ponte, Gary Gereffi, and Gale Raj -Reichert. New York: Elgarblog, 2019.
15. 崔日明, 张玉兰. 基于增加值视角下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力评估[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 (01): 127-138.
16. 闫云凤. 中日韩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比较[J]. 现代日本经济, 2018 (01): 48-59.
17. 闫云凤. 中日韩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测度与比较[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 (01): 74-80+128.
18. 肖雪, 牛猛. 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演进研究——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J]. 日本问题研究, 2018, 32 (01): 30-41.
19. 赵玉焕, 史巧玲, 尹斯祺, 姚海棠.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 40 (02): 13-26.
20. 王亮, 黄德林. 新时代背景下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经济影响研究——基于 CGE 模型的分析[J]. 经济论坛, 2019 (08): 94-103.